



# 部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地区 的生育性别偏好研究

Study on Gender  
preference for  
Children in Some  
Regions with Skewed  
Sex Ratio at Birth



---

本报告得到了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和技术支持，但此报告的内容和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见解，不代表联合国人口基金。

# 部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地区 的生育性别偏好研究



2022 年 12 月

## 报告撰写人：

汤梦君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侯佳伟 中山大学教授

---

## 访谈及记录整理：

赵晨昕 中山大学硕士生

林可欣 中山大学硕士生

沈旭棋 中山大学硕士生

唐 婕 中山大学硕士生

刘 锦 中山大学硕士生

黄 玲 中山大学博士生

刘琪晗 华南理工大学硕士生

李新春 中山大学硕士生

李凤娟 中山大学硕士生

---


## 访谈指导：

裴瑜新 中山大学副教授

---

## 数据整理与绘图协助：

毕 晨 中国警官大学硕士生



## 摘要

2020年，海南、广东、福建、江西等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仍然异常偏高，放慢了全国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的步伐。生育的性别偏好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动因。为加快这些省份出生性别比回落，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策略，对这些省份生育性别偏好与出生性别比进行深入分析。定量研究运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重点分析了海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与安徽省出生性别比的变动特征。质性研究对现居广东、江西、福建、广西、浙江与河南的49位在婚育龄人群进行深入访谈，剖析了生育性别偏好的表现及形成机制。通过1个与广东省相关干部座谈会来了解政府当前的治理举措。

2020年全国尚有20个省份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但都在下降进程中。本文重点分析的8个省出生人口性别变动与全国比有异同。性别比2020年已明显下降，但无论城乡、孩次均高。一孩、多孩以及镇的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是这些省份出生性别整体高位运行的主要原因。

质性研究发现，80后、90后在婚人群的男孩偏好已明显弱化，无偏好与女孩偏好已然出现，即使偏好男孩也是有男即可，男孩并非多多益善，对女孩的歧视性对待基本消失。由于父辈仍存在较强烈的男孩偏好，生男孩就成为子代对亲代、对家庭的“交差”。代际关系是性别偏好行为转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这些地区，传统性别分工仍然根深蒂固，习俗中重男轻女的现象仍然存在，在农村地区有无儿子还决定着家庭在社区中的地位。养儿防老的功用已大大式微，抚养子女付出的经济成本、获得的情感价值成为重要的决策考量因素。生育决策从“家本位”向“家本位与个人本位并存”转变。

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技术在这些地区存在很大需求，由于临近港澳地区且近年来打击难度大，这些技术的可获性较高。人们对胎儿生命伦理的认知日趋强烈，女性的身体自主性增强，在生育政策放宽的背景下，除了性别选择人工流产，多生成为满足男孩偏好的另一条路径。人们的生育决策更加理性，虽然生育政策放宽，但在生育成本较高的背景下，生育数量与满足性别偏好仍存在竞争性关系。

这一研究使用最新的数据资料，揭示了出生性别比的新动向和这些地区生育性别偏好的“变”与“不变”，还原了人们性别偏好的产生机制，也生动展示了实现性别偏好的路径。由此也提出了加强政府治理、转变治理思路、推进公私领域的性别革命、改革传统习俗、加快老年人与青年男性观念转变等政策建议。

# 目 录

<b>一</b>	<b>研究背景</b>	1
<b>二</b>	<b>研究问题</b>	2
<b>三</b>	<b>研究方法与数据</b>	2
<b>四</b>	<b>文献综述</b>	4
	(一) 社会经济发展、性别平等与性别偏好	4
	(二) 家族主义文化、父权制与性别偏好	5
	(三) 生活环境、生育自主性与性别偏好	6
<b>五</b>	<b>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b>	7
	(一) 全国出生性别比概况	7
	(二) 本研究重点省份的出生性别比	12
<b>六</b>	<b>质性研究的发现</b>	17
	(一) 生育的性别偏好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	17
	(二) 性别偏好的产生机制	21
	(三) 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技术的可获性较高	29
	(四) 多生成为除胎儿性别选择外满足性别偏好的另一路径	31
<b>七</b>	<b>讨论与结论</b>	32
	(一) 年轻一代男孩偏好弱化但生育行为受父代的影响	32
	(二) 男孩偏好的社会文化原因并未完全消失	33
	(三) 男孩偏好向行为转变的现实可行性较强	33
	(四) 赋权女性、促进男性观念转变的作用突显	34
	(五) 出生性别比变动呈现显著特点	35
<b>八</b>	<b>政策建议</b>	35
	<b>参考文献</b>	37
	<b>附录</b>	40

## 一、研究背景

基于性别偏好的性别选择是极端有害的行为，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中国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也一度是偏高程度最大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并持续上升，在2004年达到121.18的峰值，后开始下降，从2009年的119.45降至2020年的111.3，2021年进一步降至108.3<sup>1</sup>，但仍高于103-107的正常范围。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在中国已成为一个区域性問題。在偏高的省份中，海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与安徽8省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高位运行。2020年，这8个省份总人口占全国的32.5%，出生人口占全国的44%（见附表1）。一个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具有自我调节机制（W. Xiong, 2022），人口迁移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性别结构失衡，但持续失衡的累积效应将影响这些地区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些省份延后了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正常的时间，使我国在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排名居后，影响了可持续发展2030中性别平等目标的实现。

生育性别偏好是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决定因素，决定了未来出生性别比的走向。2021年开展了全国大多省份的生育性别偏好的定量研究，将2019年理想子女数呈现出的性别偏好区分为“儿女双全偏好”“有男孩偏好”“有女孩偏好”及“无所谓男孩女孩”，并计算理想子女性别比，结果发现，大多数省份已从“儿女双全”偏好基础上的“男孩偏好”转为了“无偏好”或“女孩偏好”，但江西、广东、广西、福建等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省份男孩偏好还较为强烈。江西、福建、广东与广西持“无偏好”与“女孩偏好”的人群所占比例在16%以下，低于全国21.3%的平均水平，广东与广西的理想子女性别比还大于100（汤梦君，2021）。

与40年前相比，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快速的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进程使城市现代生活方式更普遍，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男性与女性在受教育、健康与社会保障上的差异日趋缩小，性别平等的观念正逐步被接受。换言之，以往驱动性别偏好的社会经济与制度性因素正逐步瓦解。最近十年生育政策逐步放宽，外部政策基本不对家庭生育空间产生挤压。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并不落后，广东与福建还是比较富庶的省份，但男孩偏好坚挺，出生人口性别比迟迟无法恢复正常，一定有原因。

为了加快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正常，有必要基于以往的定量研究结果，进一步分析这些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特征，深入剖析其性别偏好变动相对滞后的原因，进一步了解性别偏好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关系。这样的研究对于分类指导出生性别比治理、加速男孩偏好弱化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

<sup>1</sup> 2021年数据引自【数说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统计微讯 2022-10-10 11:15 发表于北京。

## 二、研究问题

1. 目前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的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什么样的变动轨迹？出现什么新的特征？
2. 在社会经济发展、生育政策日渐宽松、性别趋向平等的时期，这些省份生活的年轻夫妇具有什么样的生育性别偏好？有些什么新变化？他们采用什么样的行动策略来实现偏好？
3. 在个体与家庭层面，生育男孩与女孩的价值是否仍存在很大差异？想生男孩主要出于什么目的？满足了什么样的需求？代际关系、生活环境在其中起到多大作用？
4. 为什么在这些地区仍存在这样的生育性别偏好？在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家庭构成等方面，这些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比，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

## 三、研究方法 with 数据

本研究采用混和方法策略，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同时采用定量与质性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面，由于2021年的研究已分析了理想子女数的性别偏好（汤梦君，2021），没有更新的性别偏好数据，因此仅对最新的202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特征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分城乡和孩次，通过0岁人口性别比间接评估地级市的出生性别比。定量数据分析的重点是8个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省份——江西、海南、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与安徽，主要考虑这些省份性别比在全国前列，且长期偏高。贵州省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虽然也较高，但它偏高时长不及前面8省。

考虑到中国出生性别比是上一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真性失调，故本部分使用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4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出生性别比数据来源于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主编的《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主编的《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主编的《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地级市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没有公布，用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的《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20》中0岁人口性别比对其间接估计<sup>2</sup>。

定量的研究能描述现象，但却无法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从定量研究中，可以获知不同城乡、孩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但却没法判断，为什么同住在一个地方、同样生两个孩子，有人实施了胎儿性别选择，有人没有。定量研究无法穷尽不同的情境，也不可能展现出每个人复杂的决策过程。只有结合具体的文化背景、人格特征以及社会情境，才能更为有效、有意义地了解人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生育性别偏好。本研究也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与育龄人群的深入访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史、生育史，在他们特有的“情境”下理解他们的性别偏好。

由于新冠疫情，本研究无法到实地进行调研，项目组广泛地招募合适的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开展了线上访谈。访谈对象为常住在广东、江西、广西、海南、福建、湖南等省，有故事且愿意谈的在婚夫妇，未强调要有明确的性别偏好。广东省经济发达，出生人口居全国第一，在生育数量及性别结构上具

<sup>2</sup> 出生人数在1万人以上计算出生性别比才能避免随机波动，2020年绝大部分县的0岁人口不足万人，故暂不分析县级的出生性别比。



有很强的代表性，因此作为定性研究访谈对象的主要来源地。为了在有限时间内获得相对集中的信息，访谈对象不包括这些夫妇的父辈。

确定访谈对象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个人亲属朋友圈来寻找，通过滚雪球的方式，相互介绍，扩大范围，尽可能保证对象的典型性与代表性；二是在“豆瓣”上发放话题招募，个人自愿报名，经过筛选后确定是否纳入访谈。

以饱和理论为指导，在2022年10月至11月间，课题组共访谈了49位在婚育龄人群，均获得知情同意。每次访谈时间在30分钟以上，录音并转录为文字。主要访谈对象其主要特征见图1与附表2。

其中，男性（含夫妻共访）6位，女性43位，年龄在21-42岁，集中在25-39岁的生育高峰期。文化程度以本科为主，职业分布较广。居住地以广东省、城镇地区为主，也有现住福建、江西、广西的农村居民。现居城镇地区的访谈对象有一半左右家乡在农村，农村生活对他们现在的观念与生活方式还有较大的影响。从婚姻生育情况看，初婚为主，有个别离异、再婚，孩子数以1-2个居多，有3孩的，也有现孕及暂时没有孩子的。最后访谈对象以城市居民、本科以上、女性、广东省居民居多，但覆盖面相对较广，可以基本满足研究需求。

同时，课题组还线上访谈了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及3个县市卫生健康委干部。广东省第七次人口普查中0岁组人口数量超过万人，且人口性别比超过120的县区共有9个<sup>3</sup>，从中由省里确定了3个县，分别是梅州市五华县、茂名市高州市与湛江市的雷州市。座谈会主要了解了政府当前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相关举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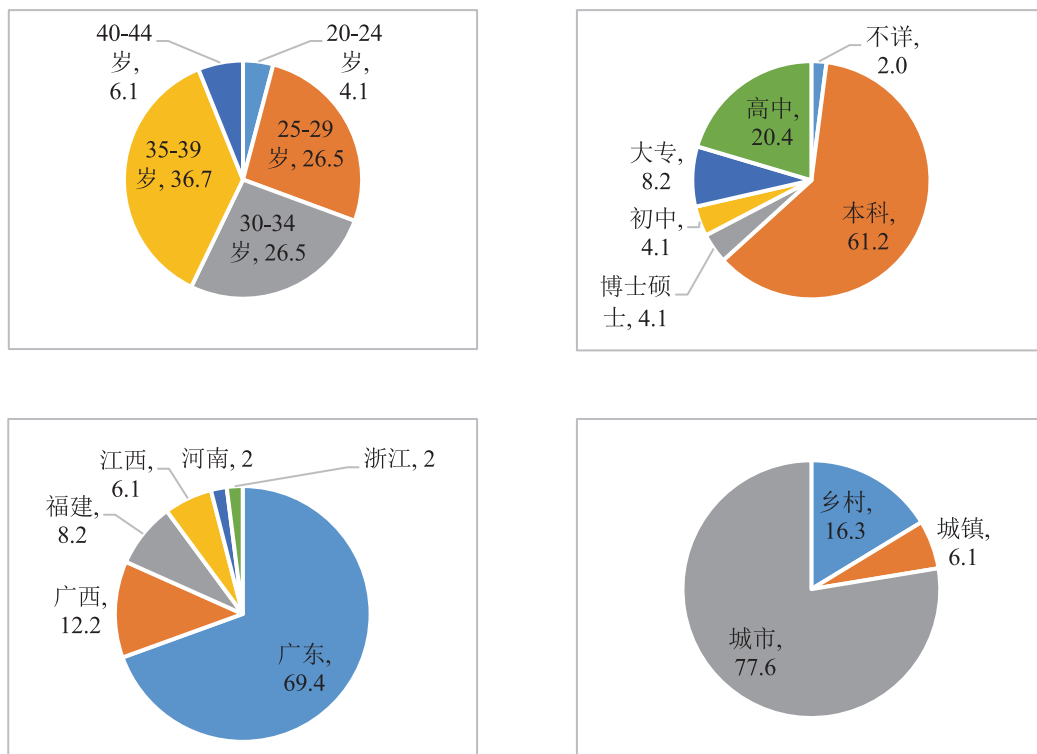


图3-1 访谈对象的年龄、教育、现住地省份与城乡分布

<sup>3</sup> 这9个县区分别为，分别是湛江市廉江市、雷州市，茂名市电白区、茂南区、高州市，云浮市罗定县、肇庆市怀集县、梅州市五华县、汕尾市陆丰市

需要说明，由于研究方法与数据，本研究可能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由于深入访谈全部在线上进行，无法获得对研究省份的感性认识，无法结合访谈对象的生活状况来深入理解他们的生育偏好。第二，公开出版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出生数据较为有限，无法深入分析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其他特征，比如母亲教育程度、民族、已有孩子性别构成。第三，质性研究采用的是归纳的思路，从资料中总结概括研究发现。访谈对象中农村居民、低教育水平、男性人数较少，存在一定偏误，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推广性需要进一步考察。

## 四、文献综述

生育具有数量、性别与时间三个维度（顾宝昌，1992）。生育的性别偏好与数量偏好相互交织，直接影响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在家庭生育数量下降的背景下，强烈的男孩偏好转化为胎儿性别选择行为，导致100个活产女婴对应107个以上的活产男婴，即出现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生育的男孩偏好是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根源。不同国家地区的生育性别偏好不尽相同（Kana F, 2010）。一些人偏好男孩，一些人偏好女孩，偏好只代表有胎儿性别选择的可能性，并不必然会实施胎儿性别选择。

在贝克尔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孩子被当作一种特殊的商品，生育被看作是对孩子的需求和对其它商品的需求作了比较后所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基于这样“经济人”假设，生育孩子有成本和收益的考虑，蕴含着效用最大化的动机。当然，成本与效用的比较并不纯粹是经济的维度，还包含了众多社会、心理的维度，也并不仅着眼于当下，还考虑了将来的变化。

在个体的层面，生育性别偏好是动态的，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水平、居住安排、现有子女结构等的变动会改变男孩与女孩成本与效用的对比关系。在人群的层面，生育高峰人群的性别偏好构成了社会主流的生育性别偏好。不同出生队列人群的性别偏好带着成长同期发生的文化变迁、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的烙印。随着不同出生队列人群相继进入和退出生育期，社会主流生育性别偏好也会发生变化。

### （一）社会经济发展、性别平等与性别偏好

生育性别偏好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在农业社会，体力劳动为主要生计来源，男性在体力上优于女性。男性的受教育程度高、社会阅历相对丰富，可以带来更多的财富。在缺少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代际反馈机制，抚养儿子并依靠儿子养老，多一个儿子就多了一分养老的确定性（费孝通，1998）。儿子多意味着人丁兴旺，还带来家庭势力的增长。由于两性在资源占有和利用上的差距，有无儿子对家庭生计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差异。在具有文化相似性的东亚与东南亚10个国家中，人类发展指数低的国家整体更偏好男孩，教育程度低的人群中男孩偏好较为严重，年轻的出生队列男孩偏好明显弱化，一孩是女孩的家庭，生育数量将比男孩的家庭平均多0.16个孩子（Nahid Tavassoli, 2021）。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男孩与女孩效用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一方面，男孩的效用在不断下降。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发展克服了劳动力体力的局限，男孩作为不可或缺劳动力的优势随之消失。中国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政策实施使当地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降低了大约10% (Ebenstein and Leung, 2010)。城镇化、人口迁移流动的增加使子代与父母同住的比例在下降，老年人单独居住比例上升，男孩在养老方面的优势也在逐渐消失。农村基层组织发展、法制化程度提高也无形中减少了儿子在壮大家庭势力中的作用。

另一方面，男孩的结婚成本远大于女孩。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传统是，在结婚时男方要付给女方彩礼，还要购置婚房，进一步增加生育男孩的成本 (Wei & Zhang, 2011a, 2011b)。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男孩的经济投入数倍于女孩。住宅价格越高的地区，生育男孩的意愿越弱，房价对育龄人群的男孩偏好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蒲艳萍等, 2020)。反之，适婚人口性别比高进一步拉高了男性结婚成本，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彩礼支出上涨2.037%，但对嫁妆支出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 (张川川, 2020)。

男孩性价比下降的同时，是女孩性价比的上升。女孩受教育程度快速上升。受教育的提升增加了女性的社会参与，非农产业为主缩小了男性与女性的收入差距。有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一些茶叶种植区，女性工资高于男性，这些地区出生人口中女孩的比例显著增加 (Qian, 2008)。女儿的嫁妆并非强制要求，婚姻成本较低。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与家庭现代化，小夫妻婚后有时在娘家住，有时在婆家住，即“两头住”。居住模式的改变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夫妇同时照顾双方父母成为现实 (杨凡, 2014)。

民主法治以及社会文明的发展，使得公平、正义等价值观深入人心。女性经济独立和教育程度的提升带来了性别平等意识的提升。年轻的、城镇的以及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性别平等意识越强烈 (董惊乔, 2018)。越认同性别平等，就越不可能产生强烈的男孩偏好，也越不可能歧视女孩。

## （二）家族主义文化、父权制与性别偏好

文化造成的人的价值观对家庭生育决策具有第一位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易受外界因素干扰，改变非常缓慢。来自有男孩偏好国家的国际移民在迁入国的出生性别比也偏高，这在北美与英国的中国、韩国与印度的移民的生育行为中可以观察到 (Dubuc and Coleman, 2007; Almond and Milligan, 2013)。这说明，与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文化因素对男孩偏好起到更重要的因素。

中国历史上是“家国同构”的社会，社会由家庭、家族和宗族<sup>4</sup>来维系和整合，“家本位”的家族主义文化盛行。这一文化的内核是“重视家庭的理念或基于家庭”，要求个体要服从于家庭，而家庭延续与扩展的重要手段是生育。对血脉传承的重视、对祖先的崇拜，都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生育动力。生育也成为传统中国社会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观念实现的重要载体。

<sup>4</sup> 家族一般指一些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构成的父系单系亲属集团，按照父子相承的继嗣原则上溯下延。宗族是同一个姓的，拥有共同祖先的人群集合，通常是若干个家族的集合。

父权制的安排使儿子而不是女儿成为家庭延续的责任人，由此奠定了中国的男孩偏好。父系血统继承制、父系财产继承制和从夫居制是父权制的具体体现。这些制度通过风俗习惯、民间话语和社会规范，规定了两性在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不同的功用，决定了各自的家庭地位和社会位置。只有男性才能娶妻上门，只有生子才能延续血脉和家族姓氏，才能继承财产、提供养老保障。女性在出嫁后则脱离原生家族，为夫家生儿育女，承担赡养公婆的义务。有儿子还是女儿对维系与扩大家族的作用不同，为重男轻女的生育偏好奠定了文化与制度基础（李冬莉，1999；李慧英，2012）。家族主义文化强化了性别差异，性别文化也通过界定两性的地位角色配合与维护着家族至上的理念（汤梦君，2004）。在家族主义文化与父权制的影响下，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生男不仅关系到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还连接着百姓的人生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男孩偏好在中国已是一种制度化的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穆光宗、陈俊杰，1996）。

新中国建立后，家族主义文化遭受重创，但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和农村小农经济的复苏为父权制复兴提供了土壤，传统文化复苏，对儿子传宗接代、送终送葬的需求出现回归。一些有势力的家族集资派款大修祠堂、培修祖墓、续修家谱、联宗继祖、聚族扫墓。这些活动中只有男性家庭成员才能发挥重要作用，只有男性成员才可以被写进家谱。在集体股利分红中，“外嫁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保证，随着女孩出嫁，户口随之迁出，同时也意味着集体股利分红权的丧失。

研究发现，宗族文化强度同地区男孩偏好和女性发展显著相关，表现为宗族文化势力越强，性别比失衡越严重（张川川，2017）。宗族势力、从夫居的婚嫁模式和传宗接代观念对男孩偏好具有显著影响（盛亦男，2012）。人口流动，向城市地区的迁移，有效地打破了家族聚居的形式，部分消解了家族势力的影响。同时由于不少纯女户家庭的出现，男性人口的外出务工，一些丧葬仪式也出现了变通，女性也可以代替男性来承担（黄少宽、黄晔，2007）。

### （三）生活环境、生育自主性与性别偏好

生育具有“外部性”，生育男孩不完全是自发形成的观念态度，而是受到了外界压力而不得已的“从众”行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情境中心的，着重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及表现的适当性（许烺光，1990）。中国人倾向于顺从他人的行为，更愿意按社会期望行事，以适应和融入所处的社会环境（欧阳晓明，2002）。传统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过度社会化”现象，即过于看重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甚至以别人的价值判断来支配自己的行动，以大众行为准则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Mark Granovetter、梁玉兰，2001；刘爽，2006）。

个人的生育行为受到生活环境与人际交往网络的共同制约。在相对封闭的村落中，人们相往密切。如果生男孩成为常态，那么没有男孩就显得特殊，就要承受家长里短的议论。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获得其周围人的肯定和归属，就得生男孩，甚至生出尽可能多的男孩，相互攀比。由于生育“不趋同”产生的压力，村民们的生育行为最后都趋同，又进一步再生产与传播了男孩偏好的文化（李银河，1994；刘爽，2006；江立华、熊凤水，2007）。

经历过的性别歧视越多，女性越可能偏好男孩（杨凡，2017）。在这些女性眼中，生育男孩可以提高母亲的地位，也可以减少未来孩子的不公正待遇。在村落的小环境中，即使胎儿性别选择行为是违法的，也很可能得到村民的默许与包庇。除此之外，村落人际交往及村民的互动模式是具有男性特征的，村民构建起认同与行动策略的路径也是男性为主的。因此，男孩偏好是嵌入到村落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社会实践，不能轻易消解（张爱华，2016）。

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瓦解了村落文化对生育的影响，人口流动打破了血缘和地缘关系高度契合的局面，家庭出现小型化和原子化趋势，侵蚀着家族主义文化的根基，年轻夫妇有了更大的生育自主。城市地区居住分散，打破了封闭的“熟人社会”和“圈子意识”，人际关系相对疏离，生活相对自主。现代夫妻关系的形成有助于弱化男孩偏好。家庭地位高、权力资源丰富、对丈夫家依赖程度较低的妇女，她们的男孩偏好比较弱（杨凡，2015）。那些在抚养孩子、经济和生育决策方面都不依赖于公婆的妇女，那些生育决策受亲属和家族影响较小的妇女，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和经济能力较强、拥有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妇女出现男孩偏好的可能性比较小（杨凡，2016）。

## 五、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

### （一）全国出生性别比概况

#### 1. 城乡与孩次差异

2020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在城乡、孩次呈现一些新变化。分城乡看，2020年，三类地区都在下降，镇和乡村出生性别比下降快于城市<sup>5</sup>，均降到110-111的水平，差异逐步缩小（图5-1）。2010年后，全国分城市、镇与乡村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高于正常范围，城市一直最低，镇和乡村不相上下。镇和乡村出生性别比下降快于城市，扭转了以往乡村和镇出生性别比远高于城市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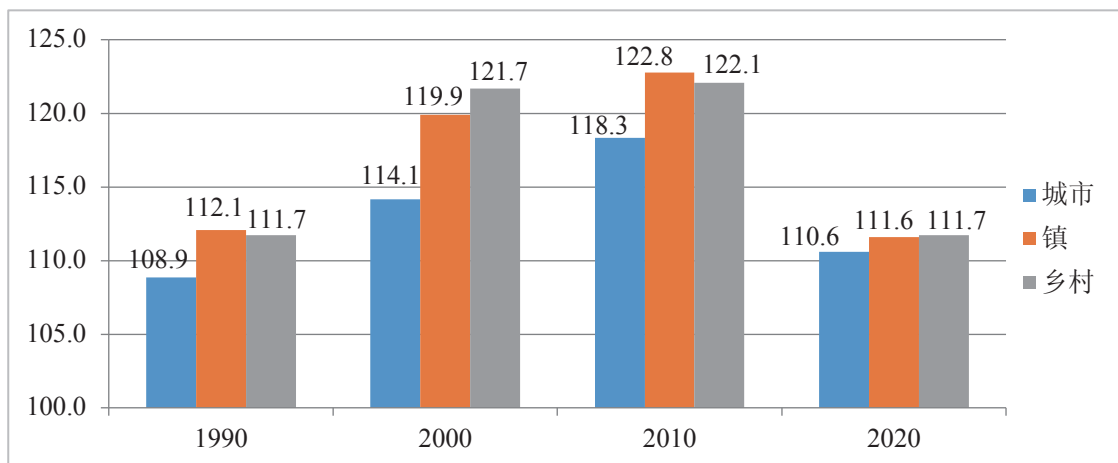


图5-1 1990-2020年全国分城乡的出生性别比

<sup>5</sup> 在全国人口普查中使用了城市、镇与乡村的区分，因此提供了分三种类型的数据。

分孩次看，出生性别比随孩次的分布呈现“U”型（表5-1）。2010年，所有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均异常偏高，一孩出生性别比首次跃出正常范围，随着孩次升高，出生性别比依次升高。但二孩、四孩、五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均下降了（石人炳，2013）。在2020年，二孩出生性别比已回落至106.8的正常值，三孩及以上的性别比下降幅度很大，从140以下回落到130左右，一孩性别比与2010年变动不大，为113.2。这意味着，第二个孩子的性别选择已几乎消失，人们生二孩不是为“生个儿”，甚至表现出“两男恐惧”（葛佳，2015；风笑天，2018；石人炳、杨辉，2021）。但一孩仍存在性别选择，三孩以上则继续是性别选择的重灾区。

综合城乡与孩次，把三孩及以上合并为多孩，如表5-2示，2020年，无论城市、镇还是乡村，孩次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U”型关系都适用，一孩出生性别比变动较小，高于正常范围，三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虽然大幅下降，但仍是最高。2020年镇与乡村二孩性别比已首先降至正常范围，城市地区已逼近正常范围。

表5-1 1990-2020年全国分孩次的出生性别比<sup>6</sup>

	全国	第一孩	第二孩	第三孩	第四孩	第五孩及以上
1990	113.9	105.2	121.0	124.3	131.7	129.8
2000	119.9	107.1	151.9	160.3	161.4	148.8
2010	121.2	113.7	130.3	161.6	146.5	143.7
2020	112.3	113.2	106.8	132.9	130.1	127.1

表5-2 1990-2020年分城乡、孩次的出生性别比

	城市			镇			乡村		
	一孩	二孩	三孩及以上	一孩	二孩	三孩及以上	一孩	二孩	三孩及以上
1990	106.0	121.5	133.0	108.5	125.7	130.9	105.1	121.1	127.2
2000	108.9	147.6	169.1	110.4	154.6	180.4	105.7	152.1	157.0
2010	113.4	132.2	175.3	114.5	132.9	169.0	113.6	129.0	154.2
2020	112.0	108.3	144.3	114.4	106.7	135.7	114.1	104.9	125.4

<sup>6</sup> 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短表中的出生性别比为116.86，长表中为119.92，因仅有长表中报告了分孩次出生性别比，故使用长表数据。2010年短表中的出生性别比为117.94，长表中为121.21，因仅有长表中报告了分孩次出生性别比，故使用长表数据。2020年短表中的出生性别比为111.25，长表中为112.28，因仅有长表中报告了分孩次出生性别比，故使用长表数据。

## 2. 区域差异

伴随着出生性别比的上升与下降，出生性别比偏高在我国从区域性问题的全国性问题，又从全国性问题的区域性问题的。分省份来看，表5-4和表5-5显示，2020年除新疆与西藏外，全国29个省份出生性别比均比2010年有所下降，已有9个降至正常范围内，尚有20个省份偏高，西藏与新疆的性别比一直保持正常。海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安徽、山东位居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的前十名，其中，海南与江西仍在120以上。不难发现，这些省份绝大多数自2000年以来就处于全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第一阵营。从图5-2中可见，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省份向东南地区集中。

表5-3 1990-2020年出生性别比分组的省份数量

	107.9-	108.0-109.9	110.0-119.9	120.0-129.9	130.0+
1990	8	5	17		
2000	3	4	17	5	2
2010	2	1	19	9	
2020	11	9	9	2	

表5-4 1990-2020年分省份的出生性别比

	1990	2000	2010	2020
海南	114.4	135.6	125.3	122.4
江西	110.4	114.7	122.8	120.3
福建	110.1	117.9	125.6	118.7
广东	111.7	130.3	120.3	115.5
广西	117.8	125.5	122.7	114.5
湖北	109.5	128.2	124.1	114.3
湖南	110.0	126.2	123.2	114.2
贵州	100.0	107.0	122.1	113.2
安徽	110.4	127.8	128.6	113.1
山东	115.9	112.2	119.4	112.0
浙江	117.6	113.9	118.1	110.2
江苏	114.9	116.5	116.2	109.0
河北	112.7	113.4	114.9	108.8
天津	110.4	112.5	113.7	108.7

	1990	2000	2010	2020
河南	116.5	118.5	117.8	108.4
北京	108.1	110.6	109.5	108.3
陕西	111.9	122.1	115.3	108.3
四川		116.0	111.6	108.2
上海	105.2	110.6	111.1	108.0
重庆	111.3	115.1	112.5	108.0
云南	107.4	108.7	111.8	107.5
甘肃	111.2	114.8	117.4	107.5
新疆	104.5	106.1	106.1	107.5
吉林	108.0	111.2	111.2	107.4
内蒙古	108.4	108.5	112.1	107.0
青海	104.5	110.4	112.4	106.8
黑龙江	107.0	109.7	112.4	106.2
辽宁	110.4	112.8	110.2	105.8
宁夏	106.7	108.8	113.9	105.7
西藏	102.0	102.7	106.6	105.4
山西	109.2	112.5	110.2	105.1

市是更小的行政单位，以市为单位可以获得更准确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信息。这里采用公布的市级0岁人口性别比，来间接评估出生性别比<sup>7</sup>。近六成地市0岁人口性别比偏高。这些地级市多成片相连，集中在东南部的海南、福建、江西与湖北省（见图5-3）。东北和西部地区，0岁人口性别比多在108以下，也相连成片。

<sup>7</sup> 分析发现，0岁人口性别比与出生性别比非常相近，2020年全国地市级0岁人口的性别比为111.2，与全国出生性别比111.3仅相差0.1。各市0岁人口性别比和出生性别比的比较如附表3示，差异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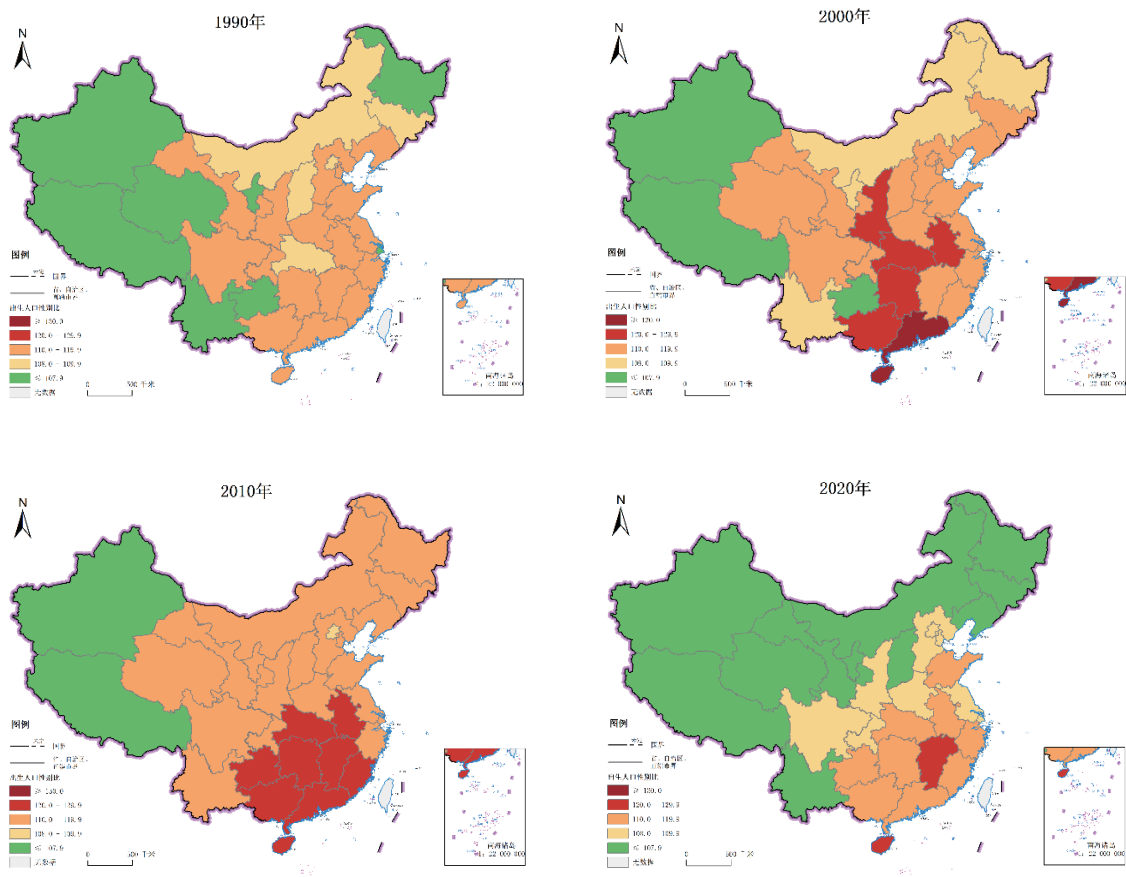


图5-2 1990-2020年省级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分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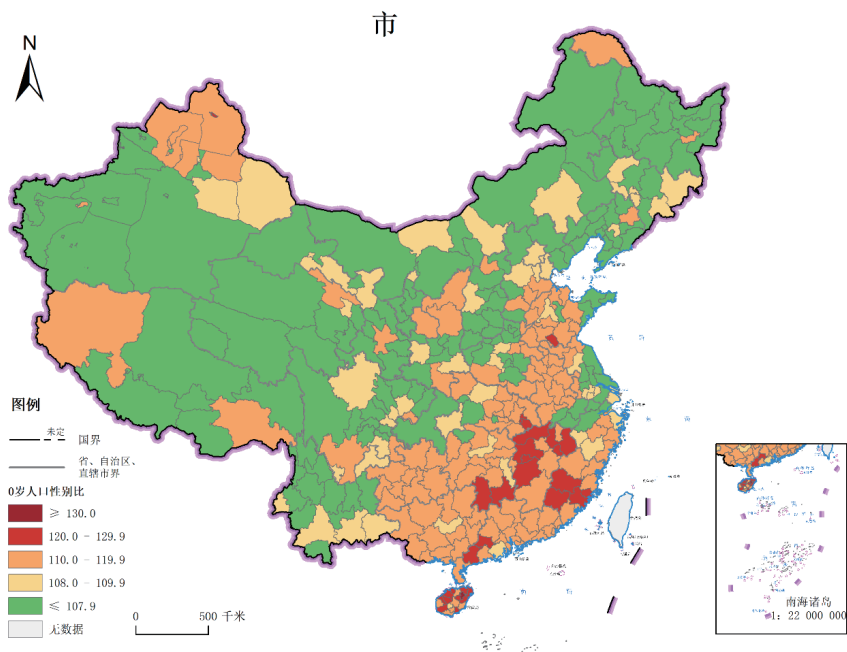


图5-3 2020年地级市0岁人口性别比分组

## （二）本研究重点省份的出生性别比

### 1. 偏高程度最高、持续严重偏高时间最长

这8个省份出生性别比都曾突破120，而且在120以上持续10年以上，如表5-6所示。海南不仅在2020年出生性别比位列第一，而且是全国保持严重偏高出生性别比时间最长的地区。海南在2000年达到135.6之后，连续三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都在120以上。江西在2010年达到122.8，到2020年尚在120以上，为120.3。广东、广西、湖北、湖南和安徽均在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时出生性别比在120以上。

### 2. 镇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

这几个省份城市、镇与乡村出生性别比也长期处于高位。表5-5显示，除了1990年的湖南城市和镇出生性别比在正常范围内，福建乡村、安徽城市、湖北城市和乡村在110以下之外，从1990年到2020年4次人口普查，这8个地区城市、镇和乡村的出生性别比均在110以上，甚至2000年时海南的镇、江西的乡村、广东的镇和乡村的出生性别比突破140。比如，海南镇的出生性别比高达144.5。

海南、福建、湖北、湖南与广东的镇出生人口性别比均高于城市与乡村。2020年，海南省不仅城市和乡村的出生性别比在115-120间，镇的出生性别比更高达132.5。海南的镇一直是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地区，而且4次人口普查镇的出生性别比均高达130以上，甚至在2000年达到144.5。广东也是镇出生性别比最高，但三者相差较小，城市、镇与乡村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17.9、118.0和116.2。江西、广西和安徽2020年镇出生性别比即便不居于首位，也与首位相差无几，比如江西的镇仅比乡村低0.2，广西的镇仅比城市低0.3，安徽的镇仅比乡村低1.0。

这些省份都经历了市镇乡出生性别比差距先增后减的过程。从1990年到2000年，出生性别比在城市、镇与乡村差距增大。差距增多最大的是安徽，1990年最低的城市与最高的镇相差3.4个百分点，到2000年，最高的则是乡村，比最低的城市高出21.9个百分点，差距增大了18.5个百分点。从2000年到2010年，市镇乡的出生性别比差距缩小。此阶段差距缩小最多的是广东，从相差15.7缩小到相差3.9，差距缩小了11.8。从2010年到2020年，江西、广东、广西、湖南和安徽的城乡出生性别比差距缩小，海南、福建和湖北是略有扩大。2020年市镇乡差距最大的是海南，镇最高（132.5），城市最低（116.7），二者相差15.8，

表5-5 1990-2020年广东等8省份分城乡的出生性别比

	城市				镇				乡村			
	1990	2000	2010	2020	1990	2000	2010	2020	1990	2000	2010	2020
海南	110.1	138.6	125.1	116.7	133.7	144.5	138.1	132.5	113.1	131.5	128.1	117.9
江西	110.3	126.4	121.3	120.6	111.9	133.7	126.9	123.6	110.4	140.8	130.5	123.8
福建	112.1	113.5	125.1	116.2	118.3	116.9	122.6	125.4	109.3	123.7	127.8	121.4
广东	112.6	128.1	131.3	117.9	119.3	143.0	128.4	118.0	110.5	143.7	127.4	116.2
广西	113.4	122.7	122.5	118.1	115.0	137.0	128.4	117.8	118.2	128.3	119.8	113.1
湖北	109.1	122.3	125.4	113.1	114.0	124.5	122.7	121.9	109.3	131.8	123.6	113.9
湖南	107.3	113.0	118.4	116.2	107.8	119.6	127.7	117.3	110.4	131.3	127.4	117.2
安徽	108.6	112.9	116.7	110.6	112.0	125.9	126.2	115.6	110.5	134.8	136.9	116.6

### 3. 广东、广西、江西、湖北、湖南与安徽二孩出生性别比低于一孩，海南与福建相反

表5-6显示，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这8个省份所有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均超出正常范围。2000年和2010年呈现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二孩与多孩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2000年福建、广西、湖南和安徽一孩出生性别比仅略高于正常范围，但二孩及多孩性别比高达150以上，江西和安徽在2000年二孩与多孩的性别比甚至在200以上。

2000与2020年，随孩次升高，这些省份的出生性别比升高。这一规律在2020年被部分打破了，海南和福建仍然遵循此规律，江西、广东、广西、湖北、湖南和安徽则是呈现U型，即二孩出生性别比低于一孩出生性别比。以广东为例，一孩、二孩和多孩出生性别比依次为118.4、111.7和131.5，二孩为最低。

2020年，这些省份的一孩性别比仍然偏高，不降反升。除福建（111.5）和安徽（112.0）外，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南的一孩性别比首次突破了120，达到121.1，这反映了生育数量减少的挤压作用，家庭在第一个孩子时就实施了胎儿性别选择。

尽管二孩出生性别比有明显回落，但尚未降至正常范围内，除湖南和安徽以外，其他5个省份尚在110以上。多孩出生性别比从高达200左右的高位降下来，但仍然在120-175之间的高位。以海南为例，第三孩、四孩和五孩及以上的出生性别比分别高达144.1、153.9和180.0。广东第三孩、四孩和五孩及以上的出生性别比依次为130.9、135.4和128.5。

表5-6 2000-2020年广东等8省份分孩次的出生性别比

	一孩			二孩			多孩		
	2000	2010	2020	2000	2010	2020	2000	2010	2020
海南	111.6	117.2	114.3	166.9	129.9	118.5	189.5	204.8	146.8
江西	115.5	113.9	119.8	203.6	139.3	113.4	207.4	162.6	160.3
福建	108.9	112.7	111.5	157.7	148.8	118.4	215.9	247.9	167.1
广东	117.3	122.3	118.4	179.7	138.7	111.7	185.1	150.1	131.5
广西	109.8	114.6	116.8	160.6	128.4	110.5	187.5	141.6	126.9
湖北	110.5	115.0	115.0	206.0	144.2	110.0	195.5	156.2	172.2
湖南	108.7	119.8	121.1	173.8	127.9	108.4	169.9	178.2	140.8
安徽	109.9	113.0	112.0	205.5	168.3	108.9	250.9	250.0	164.3

#### 4. 镇的一孩出生性别比增加

分城乡、孩次的近3次人口普查8省出生性别比变动情况如表5-7所示。8个地区无论城市，还是镇，抑或乡村，二孩和多孩出生性别比2020年均比2010年大幅下降，除安徽城市、湖北乡村和湖南乡村出生性别比恢复正常值以外，其余地区出生性别比尚偏高。有些地区二孩出生性别比尚在120以上，比如，福建的镇、海南的城市和镇。

值得注意的是一孩出生性别比的变动，有的地区增加了，有的地区减少了。海南城市的一孩出生性别比是唯一回落至正常范围的地区，为105.9，但是镇的一孩出生性别比却高达131.2，达到了一孩出生性别比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说明，海南镇上出生的孩子中人为的性别选择现象较为普遍。除了广东，另7省2020年比2010年镇的一孩出生性别比均有所增加。江西、广西和湖南城市和乡村的一孩出生性别比也增加了，而广东、海南和福建的城市和乡村的一孩出生性别比减少了。湖北城市一孩出生性别比减少了，乡村增加了，而安徽恰好相反，城市一孩出生性别比增加了，乡村减少了。

表5-7 2000-2020年广东等8省份分城乡、孩次的出生性别比

	一孩			二孩			多孩		
	2000	2010	2020	2000	2010	2020	2000	2010	2020
<b>城市</b>									
海南	124.0	112.8	105.9	200.0	145.5	122.2	162.1	287.5	149.7
江西	117.8	115.5	115.9	175.4	125.7	115.5	225.8	205.4	168.4
福建	109.1	114.1	108.2	137.1	152.4	117.2	250.0	293.2	166.2
广东	116.6	124.7	119.1	169.4	145.8	111.4	184.3	157.5	141.7
广西	113.1	114.7	118.3	163.1	141.1	112.4	220.4	182.6	146.0
湖北	112.4	116.4	110.8	227.4	164.6	112.6	221.4	222.2	171.3
湖南	105.2	116.7	117.3	168.9	123.7	109.5	148.7	122.9	166.7
安徽	108.2	108.8	109.2	154.8	155.4	107.1	154.5	164.6	183.5
<b>镇</b>									
海南	118.6	118.7	131.2	178.6	148.4	122.4	292.9	227.4	165.1
江西	120.9	111.0	122.4	192.7	140.9	113.4	234.8	176.8	160.3
福建	108.5	109.0	116.8	150.4	147.3	120.7	229.6	224.1	177.9
广东	125.3	123.4	119.0	181.5	132.6	112.0	179.9	142.0	128.6
广西	117.9	120.1	120.5	194.5	138.9	109.5	230.9	146.3	131.8

湖北	114.4	114.0	123.2	200.0	142.2	115.1	242.9	147.3	176.3
湖南	107.5	121.9	123.3	184.5	131.0	108.4	176.3	176.9	137.0
安徽	111.2	108.8	113.7	218.2	164.9	109.0	224.2	230.3	179.4
<b>乡村</b>									
海南	104.1	119.2	115.3	157.6	119.9	111.9	180.9	192.7	136.9
江西	113.8	114.7	121.3	207.4	141.0	111.5	204.8	156.5	157.2
福建	108.9	113.5	112.8	163.4	147.5	118.0	210.5	241.5	158.3
广东	114.3	116.9	115.7	184.5	133.8	112.4	186.8	149.6	122.7
广西	107.3	112.6	112.9	156.5	123.4	109.4	182.8	138.5	119.2
湖北	108.2	114.5	116.5	202.9	139.8	104.3	188.5	147.8	170.7
湖南	110.1	120.3	122.7	173.4	127.6	107.5	170.9	183.1	134.8
安徽	110.1	116.1	112.9	208.2	171.4	110.1	260.2	263.7	153.3

## 5. 0岁组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市在省内分布不均

从图5-4可见，这些省内各地市<sup>8</sup>的0岁性别比存在较大差异。0岁性别比在120以上的地市（图中深红色的区域）在海南、江西与福建省占一半以上，但在其他省已成为少数，广西与安徽甚至已完全消灭。

0岁性别比的省内差异实际上侧面反映了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文化差异。广东地市0岁性别比在120以上的市为粤西的云浮与茂名，这些地区相对欠发达，而珠江三角洲是全国最富庶、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外来务工人口聚集，城市连片发展，工作竞争激烈，生育率相对低，0岁性别比也较低。广东省内存在岭南、客家、潮汕等地域文化圈，这些文化差异导致了生育观念与行为的区域差异格局（梁宏，2018）

福建0岁性别比在120以上的城市包括西部的三明、龙岩市以及中部沿海的泉州与莆田市。江西数量相对多，11个地市中6个0岁性别比在120以上。海南有儋州、海口与省直辖县。0岁人口性别比最高的是海南儋州市，为127.7。湖南仅有郴州与永州市。跨省界来看，这些市中仅有湖北的黄石与江西省的九江市相连。在0岁性别比普遍较高的情况下，湖南、湖北与安徽省内也存在0岁性别比正常的地市（图中绿色标识的地区）。

这8省中，海南、江西与福建的0岁性别比偏高相对严重，120以上的地市相对多，110以下的地市很少甚至没有。这三省也是省级出生性别比最高的省份。

<sup>8</sup> 湖北与海南都有省直辖县，严格地说并不是地市级行政区划且年度出生人口数均不到万人。这一部分图表将省直辖县视同为地市级行政区划。图5-3中各省地图的比例尺不一致，为了排版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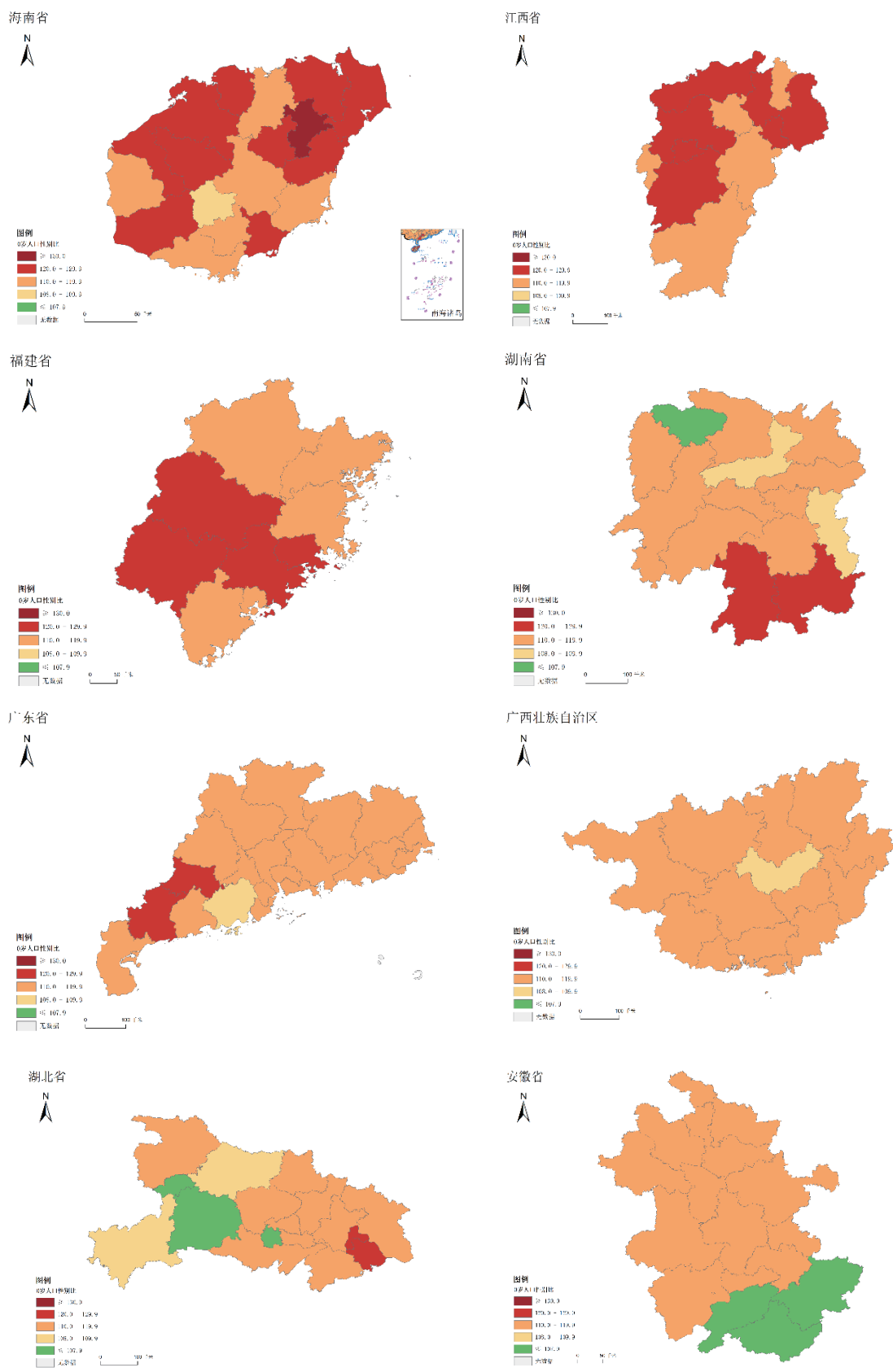


图5-4 八个省份2020年市级0岁组人口性别比

## 六、质性研究的发现

### （一）生育的性别偏好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

#### 1. 在婚生育高峰人群男孩偏好已明显减弱。

大多数访谈对象无论文化程度、居住地与职业，都认为孩子男女均可。“生孩子就像‘开盲盒’一样，随便吧，各有各的好。”（LKX3）。

儿女双全是大多数人对子女性别的期待。一位从事幼教职业的青年男性说“只要是我的孩子，男孩女孩都好。女孩子是爸爸的小棉袄，男孩子正好跟我一起玩，长大了跟我一起去锻炼身体、跑步、打球啊。女孩子我的话，我就喜欢给她穿个漂亮的衣服呀，像个公主一样，洋娃娃一样的，我觉得都很好。”（LHQ1）

但在儿女双全的追求之下，往往隐藏着男孩偏好的痕迹。在生育一孩后，访谈对象都希望二孩的性别能与一孩互补。大家都偏好目前家庭中“稀缺”的性别，这里，“家庭”的边界至少外延至兄弟姐妹的家庭，如果他们只有女儿，就希望自己生出个儿子。

一些头胎是女儿的家庭陷入了“生男孩”的压力中，表面上看在追求儿女双全的理想，但实质却是在坚持“必须要有一男孩”的底线。只有那些原本无偏好的家庭，二孩生育才顺其自然，有儿子最好，可以接受没有儿子的现实。

访谈对象的男孩偏好表现为“有男既可”，而非“男孩越多越好”。有了一个儿子后，一些人出现“两男恐惧”，希望二孩是女儿，但这并不能理解为偏好女孩，而是在有儿子的前提下对儿女双全的向往（LJ3），它包含着对女孩情感与照料支持的认可。有些人则表示“生男即止”。“小家庭里还是最好一定要有男孩子，如果第一个生儿子的话，我可能第二个一般就不会生了，很多人会这样子。第一个如果是儿子，基本上都不生，生两个的话压力很大。”（LJ1）

总的来看，子女性别偏好上已呈现多元化特征，在儿女双全偏好占主流的情况下，男孩偏好在下降，而女孩偏好与无偏好在上升。相对而言，大城市里居住的夫妇较少有性别偏好。妻子的教育程度越高、职业地位越高，越没有性别偏好。无偏好或女儿偏好在城市女性访谈对象中较为普遍。“如果说可以选择的话，我肯定是男孩女孩都要有，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我就偏好女孩儿”（ZCX2）。一些年轻夫妇在给男孩偏好贴标签，认为它与城市语境不相容，是思想守旧的象征，不愿意直接承认自己有这样的偏好。这是从男孩偏好向无差别或女孩偏好转变积极的信号。

丈夫生男的意愿相对更强一些，尤其在一些几代单传、独生子女的家庭，体现了对自己传宗接代责任的认同。“我也是，其实嘴上说没有所谓，但是心里还是喜欢男孩子多一点，因为我都是单传的，我爸爸家里也是就他自己一个男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都是这样子的。让我们延续香火嘛，从父母那一辈到我们。”“二胎还是个女的，我没有说不要啊，还安慰老婆我说没所谓，女孩一样的，但心里面想着又得要个第三胎，心里很沉重啊，很累。”（LJ7）

尽管如此，年轻夫妇已完全实现了从“出生后儿女不平等对待”到“出生后儿女无差别对待”的转变，是不小的进步。上一世纪80-90年代，中国存在偏高的女婴死亡率，研究发现这是出生后对女孩的歧视与虐待导致的（李树苗、朱楚珠，1996）。情况现在发生了根本转变。即使存在性别偏好，访谈对象在抚养、教育子女的投入上没有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女孩的健康、教育、成长等需求在家庭中可得到保障。TJ2说，“小时候我和弟弟都是爷爷奶奶带的，老人家很明显的，弟弟什么都给最好的。现在我的女儿出生后，我反觉得要给她最好的，因为女孩需要培养的东西很多，她优秀起来可以不用靠别人。”一方面，这是因为儿童与青少年的各项权利得到法律保障，公共服务实现性别“均等化”，另一方面，家庭物质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对女儿与儿子的投资并不形成竞争关系。在女儿既成事实的基础上，父母接受了女儿，且几乎无差别地抚养女儿，甚至有人在抚养女儿过程中，认识到女儿特有的优秀品质，进而打消了一定要生个男孩的念头。

喜欢的反面并不一定是排斥。对男孩与女孩的喜好与排斥程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组合，构成了如今性别偏好的多元谱系。最初是喜好男孩，但不接受女孩，因此在生育男孩和生育女孩数量都减少的情况下，先是女孩减少快于男孩，出生性别比上升，然后对男孩的喜好下降，可以接受女孩，女孩减少速度放缓，慢于男孩减少速度，出生性别比就下降（侯佳伟等，2018）。

## 2. 父辈仍存在强烈的偏好男孩

性别偏好呈现很大的代际差异。访谈对象的父母大多体现出对男孩的喜好，要求孙辈中一定要有男孩，甚至男孩越多越好。

“如果说只能选一个性别的话，我宁愿要两个女孩儿，不要两个男孩儿。但是我老公家就是宁愿要两个男孩儿”。“我公公曾经多次在我们面前透露说谁家生了十个孙子啊，真是命好，风水很好。意思是生下来的全部都是要男孩儿，才是风水好。男孩越多越好，我们刚生完孩子那几年的时候，爷爷奶奶还经常要我们再生二胎，再多生一个男孩儿，但是我们都是不置可否（访谈对象一胎是龙凤胎）”“爷爷奶奶对孙子疼爱些，却几乎不抱孙女，女孩的玩具掉了，怎么哭都不理会，女孩就当成就好像是别人家的孩子一样。”（ZCX2）

父辈年轻的年代还存在遗弃女婴的现象。“我婆婆第一胎是我丈夫，她在生下第二胎，就是我现在的小姑子时，接生婆直接就劝她，是个女儿，扔了吧。那时生了好几个女孩还是没有生到男孩的，可能都会直接扔掉或送人。”如果女儿留在家中的话，家庭资源更优先分配给儿子。“他们三兄妹，女孩就是直接在家里被忽略的那个。对两个儿子的学业非常关注，期待也很高，两个儿子都上了不错的大学。女儿初中还没毕业就出来打工了。”（ZCX2）

婆婆往往是生育与胎儿性别鉴定的主要催促者。不少访谈对象都有被公婆催育、婆婆陪同性别鉴定的经历。“第一个肯定是要孙子的了，谁想要孙女？第一个生孙子安心一点，第二个就随便生了。如果第一个是孙女，第二个要又是女孩，就更大压力了....”。有所区别的是，有的婆婆会催促媳妇去做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有的婆婆稍微温和一点，会要求媳妇“多生”来实现生男的愿望。“第一个生女



儿，第二个也是女儿的话，那没办法，爸妈不会叫你打掉的，都是自己的小孩。但是如果有的选的话，喜欢男孩子是不用说的。”（LHQ2）

一位访谈对象有位极端重男轻女的婆婆：“我刚生完第一胎坐月子，我婆婆就从茂名乡下来到广州照顾我。才生完孩子十天的样子吧，她说，你不是休几个月产假吗？你要不马上又怀一个。我说为什么呀，我身体还没恢复好哦。我很震惊，很不理解。她解释说，反正有几个月产假嘛，你马上怀。如果是女孩子呢，就把她打掉，如果是男孩子，那就把他生下来。你想想哦，当时我第一次当妈妈，第一次坐月子。我没想到这样的话会从一个妈妈的嘴里边说出来。她怎么能这么残忍呢？其实就是太过于重男轻女了，她就是觉得我生的是女孩子。”

“我不是还有个小叔子么，结果我婆婆说，就算弟弟生十个儿子，我都没有份。每一个男孩子名下要有男孩子传承，一定是自己生的儿子才算，这个小叔子生的，跟你一毛钱、一分钱关系都没有。她希望我，一定要生一个男孩，然后呢，最少生三个孩子。”（LKX9）

父辈们的男孩偏好已经内化成为价值信念。“我妈那一代就是拼儿子，其实他们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他们有时候都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生个儿子，就知道在农村就得有个儿子”（LKX06）。同样重男轻女，婆婆与娘家妈妈的立场不同。婆婆已经将自己内化为夫家的一员，希望能为夫家传宗接代。娘家的妈妈则多是根据自己经历，希望女儿通过生个儿子以巩固在婆家的地位。

男孩偏好的形成与父辈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社会规范以及长期嵌入其中的乡土生活环境分不开。环境能塑造观念，同样也能改变观念。有访谈对象称，原本催生的父辈，在城市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感受到城里的快节奏生活、互不干涉的人际交往，尤其是知道生孩子会影响儿媳的工作与收入后，悄悄地改了主意，不再催生（LKX1）。

### 3. 生男成为子代对亲代、对家庭的“交差”，也成为两代人相互博弈的产物

中国的代际文化强调父母与子女的“和合”与“共生”。现代化进程中，代际支持的传统仍得到了延续，亲子家庭之间普遍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代际关系不是单一的反哺型，而是因为居住安排、经济往来与日常互动呈现出复杂性。生育观念的代际差异产生了父辈“必须生男”的要求和子代生育自主性之间的冲突，生育成为两代人之间的“拉锯战”，在传统“孝”文化的影响下，在代际互动过程中，两代人的博弈产出不同的结果。

没有儿子的女性在访谈都讲述了公婆给自己的生男压力，这样的压力往往不是明说的，而是暗示，或者带着道德绑架，以经济或行动的支持作为“交易”。比如，LKX9在生出两个女儿后，公婆找了算命先生，说生不出儿子是因为媳妇命里有白虎，已花了大价钱将白虎去掉了，劝说媳妇再生二胎。公婆还软硬兼施，先是威胁大儿媳不帮忙带孩子。而LKX9生气地还击说以后等公婆年老后，也不要指望她去照顾。父辈帮忙带小孩、和为父辈养老这两者，在两代人的家庭斗争中互为筹码。LKX9在家选择全职带孩子，公婆后又改变策略，表态愿意帮助照顾二孙女，以减轻儿媳的照料压力，尽快备孕，并且说“再生一个，我们两个老的很乐意啊，就算生到女孩，也不会说什么”。

两代人关于生育的家庭斗争，最后以儿媳的妥协为结果。在公婆的低姿态下，她的思想松动了，周围人又推荐了十分灵验的“中医生男偏方”。她于是开始积极备孕，终于第三个如愿生下了儿子，“让老人家开心了”。

LJ4在第一孩生了女儿之后，与重男轻女的夫家进行了一场无声的抗争。“更完美的状态当然是一男一女，二胎的话我也希望是有个儿子，我也算任务完成。我跟他们说，我已经怀上了，可以去做一下鉴定，如果是女孩，你们决定留不留，但是如果要我拿掉这个宝宝，那我也不会再生了，你们自己决定。后来刚好是个男孩，那就生下来了。”她不愿意因为胎儿性别人工流产，但如果第二个是女孩且夫家决定不要的话，她会顺从，但会用“我不再生”作为抗争的武器。

当今社会，父代并没有绝对的权威，子代对父代的顺从多出于父代对自己小家庭的支持，要么在经济上还“啃老”，要么父代帮忙带孩子。这些支持是中国代际关系紧密的特征之一，也是父代的策略，以此换来子代的孝顺与感恩，来服从自己的意志。在子代看来，父代的确观念落伍，甚至父母对自己的生活“不配提意见”，但完全中断与父代的联系，永远不对父代有所求，完全反抗父母的意见，也是情感与关系上不可接受的。自己做出妥协，换来父母的大力支持，也是维持家庭关系和睦、缓解生育养育压力的两全之策。

“交易型”代际关系在访谈中不在少数。大多数年轻人希望尽可能满足父代的心愿，另一方面也希望保留一定的自主性，并从父代处获得更多生活与子女养育的支持。访谈对象纷纷表达一种理想状况，这是权衡之下的妥协：第一胎生男孩，这样就不会继续被催生，第二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生不生、什么时候生、生几个都相对自由。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一胎性别比的居高不下。他们将生孩子作为“人生任务”，是对父母的“交差”。“如果没有勇气去跟你父母去对抗，最终还是要生的话，那就还是早点吧，不然的话到时候恢复更差。你的身体又不允许的时候，你就更烦。”（LKX03）

是否与公婆共同居住、经常联系走动以及女性的自身与原生家庭条件，也是决定父代对子代生育决策影响力大小的关键因素。子代如果从父代获得较多资源，或者两代人共同居住，联系的频率越高，父辈带有生育偏好的“催生”会越多，越有力量。反之，父代在生育上对子辈的干预较少，或者没有“话语权”，“只要是自己的孙子都会喜欢”。

ZCX5与公婆同住一村，走动频繁，她一方面感觉自己是生育机器，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顺着公婆的意愿生二胎，因为自己娘家很远，几乎帮不了自己，而全职主妇又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也担心丈夫会因为自己没有儿子嫌弃自己。“那我肯定希望（二胎生男孩）了。因为我跑这么远嫁给他，如果万一是个女孩，我以后生还是不生。我也希望他是个儿子，了他们家的心愿。心里总有这个东西，总会想着希望他是个儿子。”（ZCX5）

## （二）性别偏好的产生机制

### 1. 家庭主义文化与父权制影响下的性别不平等

#### （1）历史地理原因

家族主义文化在当地有深远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到战争、人口迁移的影响，家族文化走向解体，宗祠也较少见，即便存在，也没有很强的凝聚力。这些省份离中原地区较远，受战乱影响小，更大程度地保留着聚族而居的习俗。家族内部认同感、凝聚力依然非常强，也保持了大家庭的传统。在家庭构成上，三代户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附表1）。

这些地区还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支，历史上由于战乱灾荒及官职迁调等原因，自中原黄河流域辗转南迁，由于居住隔离及语言独特，保留了许多中原汉民族的文化习俗。多次迁移后的生存竞争，使客家人的族源观念尤其强烈，具有更强烈的以血缘观念为本源的“祖宗崇拜”（李涌平，1995）。

#### （2）家庭分工

这些省份女性受教育水平相对偏低。除广东15岁以上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余7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附表1）。从家庭分工看，家庭大多维持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男性在外挣钱，家务与孩子照料的工作主要由女性承担。在广东与福建，市场经济发达，也有一些妇女与丈夫共同经营生意，但她们和丈夫一起，通过家庭经营和家庭化生产的方式进入市场。在家庭经营中，丈夫一般是主导者，妇女往往是辅助者，使她们的劳动价值隐形化。如果在机构或企业就业，女性倾向于选择有利于照顾家庭的工作，体现出女性对家庭更强的“责任感”，也使女性的收入与社会地位低于男性。婆婆与母亲是家务的主要帮手，特别是婆婆，这实际上也是父权制家庭结构的体现。

即使妻子收入比丈夫高，丈夫更会带孩子，也不能让外人知道。“大家觉得老公的衣服就要老婆洗。因为这个事情我还跟我婆婆发生争执。她说，你可以不用洗衣服，但是你不要跟外面的人说。她不希望我去传达出‘我老公主内、我主外’的思想，他们怕丢我儿子的脸……他们觉得男人要比老婆赚的多才是对的。在外面，假如说五十多岁的人吵架，他们会说，我不跟你吵，把你儿子叫过来。儿子再没用，也都是儿子出来。女儿没什么用的，嫁出去了就是别人家的人了。他们甚至觉得我是女儿，能赚钱，对我爸我妈来说也没什么用。他们认为我弟弟赚钱对我父母来说才是有面子。”（LHQ2）

#### （3）从夫居的制度安排

这样的观念与“从夫居”的制度安排是分不开的。儿子被认为是“自家人”，而女儿迟早要嫁出去。“大部分的财产，就得留给自己的儿子。给了女儿，就好比是把东西给了别人一样”（ZCX8）。这些省份的民营企业、家族企业较多，家族资产传承的需要也刺激了对男孩的偏好。有儿子的企业具有较强的传承意愿，更希望企业在家族内世代延续（沈艺峰、陈述，2020）。

“只要是儿子，就永远是一家人，女儿反正嫁出去了，就不算一家人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前提下，女儿永远得迁就儿子。公公婆婆甚至还认为，不管是自住还是跟儿子一起住，我的房子永远都是儿子的，而不是女儿的。如果女儿出现了困难，她回来也是不可以的。假设说我买不起房子给我儿子，老了就叫我去住老年公寓，把这个房子留给我儿子、儿媳妇住。”（LHQ2）

“从夫居”在这些地区有所松动。在迁移流动增多的情况下，年轻人到城市后大多数与双方父母均不同住。婚后“两头住”现象也有，“不招郎也不入赘，可以两边走，结婚后可去男方家生活，也可以在女方家生活，哪家条件好你就在哪家生活，两个孩子就一边一个姓氏”（LHQ3）。

居住安排的改变只是第一步，但对家庭的归属感很难这么快改变。父辈更重视与儿媳的关系，因为儿媳是自己人。LHQ2 转述她婆婆的话，“儿子就是一个宝贝，媳妇跟儿子在一起，儿媳妇决定了儿子的幸福程度，那我对儿媳妇好，是不是儿媳妇就会对儿子好，所以我要对我儿媳妇好，而且我老了以后，儿媳妇是自己人，会照顾我，女儿是嫁出去的，她照顾不了我。但是儿媳妇近，我对我儿媳妇好，我儿媳妇以后就会对我好。女儿再怎么也都是嫁出去的。”

#### （4）传统习俗

习俗中还保留着重男轻女的痕迹。这些地区续家谱、建祠堂、祭祖等活动十分活跃，存在着强烈的“丁崇拜”，即对男丁的祈求和尊崇。在建房、修坟时，福建一些地区专门设有“丁”字型的砖，意味人丁兴旺。婚礼中，枣子、莲子、瓜子、桔子、花生、石榴、桂圆等寓意“早生贵子早添丁”的果品必不可少。在丧礼上，挑幡竹，引灵上天、捧香炉或捧祖公牌、接续香火等主要角色都由“丁”承担，如果没有男丁，就是“绝嗣”，无子送终、无丁接续香火，祖宗的血脉就断了，这是大不孝，是奇耻大辱（黄少宽，黄晔，2007；陈凤金，2009）。

元宵灯节是最典型的“丁崇拜”节日。“丁”与“灯”同意，灯笼也就成为“生男孩”的象征。在农村过元宵节，只有生了男孩的家庭才有资格在祠堂或是自家门口悬挂灯笼庆祝。生了男孩的家庭会给村民发放“添丁油饼”（关秀芳，1997）。这些地区清明祭祖、舞龙、舞狮、赛龙舟等民俗活动格外隆重。男性是这些活动的主角，女儿不参加祭祖，甚至还有女子不能起龙舟、舞龙、舞狮、上龙舟等文化禁忌，认为女性碰触这些物品会带来不吉利。

生儿子了才庆祝，生女儿则低调。“在莆田老家，我儿子那时候是有摆满月酒的，我女儿就没有，习俗就是这样的”（LHX02）。在浙江温州的LHQ2说，娘家的家谱上她没有名字，但是弟弟有名字。更奇怪的是，“我家户口本上，我明明比我弟弟大，对不对，但是我弟弟在我的前一页。我爸我妈怎么可能去调？应该是公安局那个系统调的”。在拆迁算家庭人数时，“三个女儿就算一个人头，只有一份钱，但是三个儿子分三份钱”。

#### （5）传宗接代

儿子传宗接代在这些地区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没有女儿的家庭用了培养长女、招婿上门的方式来延续香火。在江西井岗山，姐姐招婿上门的LHQ3介绍说，因为是双女户，大的女孩从小作为男孩来培

养，父母经常带姐姐参加活动，所以姐姐了解村里的风俗习惯，也与亲戚相熟。村子里入赘的情况还比较普遍，对儿子的偏好并不严重。但有儿有女家庭的招赘上门还不可行。这些入赘的男性不仅没有受到歧视，反而还得大家的尊敬。

女儿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成为儿子的替代，招赘上门的夫妇也面临着传宗接代的压力。女婿不改姓，但生的第一个小孩要跟母亲的姓，意为传承母亲家的血脉。但是，在依父系延续的家谱中，女儿与女婿的名字，都没进入家谱，“是儿子有详细的说明，会有具体的姓名，也会有长子、次子之分和他们的孩子。但是女儿一般只写数量，没有具体名字。”（LHQ3）

## （6）性别刻板印象

女性在资源占有上处于劣势，因此这些地区还存在“女性能力差”的刻板印象。ZCX2提到自己开车回丈夫老家江西赣州时，大家都很惊讶，“‘哇，你们湖南女人会开车啊？’我也挺惊讶的，女人开车不是个很正常嘛。我就留意一下，哦，果然在他们那里没看到一个女性开车的，可是在我的家乡开车的女司机应该已经超过半数了。”驾驶不仅是种技能，它能大大拓展行走的范围，因此开车就意味着资源占有。它与吸烟一样曾经是男性的符号。女性开车是女性对传统男性领域的侵入，对它的诧异则说明当地人的性别刻板印象。

## 2. 儿子与女儿的生养成本与价值差异

### （1）男性普遍婚姻成本较高抑制了男孩偏好，但经济富裕地区女性婚姻成本有上升趋势，可能减慢男孩偏好的转变

随着物质条件改善，年轻父母在子女生活与教育投入上没有明显重男轻女，反而有些“儿子穷养、女儿富养”，为了采用性别差异的抚养方式，来塑造儿子与女儿不同的性别气质。儿子与女儿的生养与教育成本在现阶段差异不大。“男孩女孩的花销都是一样的，衣服也都是一样的，穿纸尿裤也是一样的，奶粉都是一样的喝”。（LHQ1）

最大的差异在于儿子与女儿的婚姻成本。大多数地方，儿子结婚都需要有婚房，还要支付一笔金额不菲的彩礼，资金主要来自父母。

许多人认为儿子婚姻的付出是必须的，是父母的义务，而对女儿的支持则量力而行，嫁妆金额不会超过彩礼。TJ4说，“生儿子的话，你以后可能会帮衬的更多一点。要给他筹备房子，还要考虑他有没有找到女朋友，有没有老婆呀，以后生完了孩子还要帮他带。生儿子花的费用比女儿多，而且操心的也比女儿多。女儿也不能说什么都没有。如果有条件的话，该支持的都还是要支持吧。”

“女儿是招商银行，儿子是建设银行”，由于彩礼、婚房的刺激，儿子的婚事成为代际资源转移的重要手段，生养男孩的压力更大，削弱了一些人的男孩偏好。“我宁愿生女孩。我觉得生男孩压力好大，比如说生三个就三套房呀！好像已经成了我们这边的一个观念，已经植入了我的大脑，深入人心。”（LKX04）

有的访谈对象则认为“男方买房”这一习俗有谈判议价的空间。“我感觉养女儿比养儿子还费钱，小女孩子从初中以后就开始打扮了。小男孩儿不就是普通的衣服、鞋子。至于男孩结婚父母给买房、彩礼之类的，要是能找个通情达理的亲家，可以少要一部分彩礼，或者双方都可以帮助一起买个房子。”（ZCX8）

在经济富裕的地区，女儿的嫁妆以及娘家的经济补贴近些年水涨船高，广东潮汕地区有访谈对象LKX1说“假如男方出房出车，女方什么都没有，那嫁过去父母也很没有安全感，因为没有给到女儿什么，女儿背后没有强大的后盾的意思，女孩子嫁过去是会自卑的。”嫁妆显示了娘家的财力，为女儿提供经济支持，也可提高女儿在婆家的地位。在浙江温州，根据当地的习俗，综合算下来，父母为女儿婚姻与婚后生活的支出反而高于儿子。

“假如女方家长不要面子，肯定是男孩子的结婚成本高。男孩子要买房有车，办酒。但现在没有陪嫁的女孩子比较少。要讲面子的话，同样的家庭，肯定是女方结婚成本高。彩礼可能收50万，但陪嫁现金50万算是一般的，100万是好点的家庭。女儿怀孕时，娘家要给红包，我们这里叫‘烧肉’，坐月子也是娘家出钱。宝宝生出来，外婆要包大红包，满月包大包，四个月包大包，一周岁包大包，上学也要大红包，差不多女方家包红包、打金手镯金项链金戒指给宝宝，加上陪嫁，杂七杂八的，都是要办大礼。男方是摆酒的，摆酒给外婆吃，外婆是送东西的。基本上我这些邻居怀孕的时候，父母都给10万块的红包。我们温州有一个话叫做‘妈妈生、外婆养，爷爷奶奶来欣赏’。生儿子就是赚的，娶了媳妇就从女方那里拿钱，所以女儿是没用的，都是倒贴的。儿子花的钱起码在身边看得到，儿媳妇也在身边，孙子也在身边，但做外婆的钱永远都是给别人家的。”（LHQ2）

富裕人家不断抬高数额炫富，普通人竭力赶上以便减小差距，最终就形成全民参与的高嫁妆之风。在新消费主义与荣攀比之风的影响下，在“从夫居”的制度安排之下，获得的嫁妆与补贴就成为女性在夫家的筹码，生男往往意味着“致富”，而生女则是“致贫”的预兆。温州出现的这一现象与印度的嫁妆制度很相似，使得儿女的婚姻成本出现反转，很可能会减缓当地男孩偏好的弱化。

## （2）养儿防老需求下降有利于弱化男孩偏好

父母对儿女养老的期待在逐步式微，无论城乡与受教育程度，访谈对象几乎没有人希望依靠孩子养老。“养儿防老是60多岁的人老了没有固定收入啊，得靠孩子给钱才能生活下去啊，我们现在都有社保，以后不至于没饭吃吧”（LKX3）。

一些女性从自己的性别角色与养老需求出发，希望有女儿，因为女儿更贴心、顾家，可以给父母更多的情感与照料支持。“女儿和自己亲近，以后老了照顾自己也方便，儿子以后会有老婆啊，好多东西不方便”（TJ8）。当然也有人希望一儿一女，因为这样照顾起父母来更加方便。

做社会工作的访谈对象LKX8谈起自己服务老年人的经历，“做长者领域的时候，找女儿会多一点，找儿子很少。尽管老人有很多个儿子，也会去找女儿。女儿会更上心，儿子要工作什么的。有一种感觉，女儿会比儿子更靠谱。”（LKX08）

随着养老保险的普及，养儿防老已不是生育或者生男孩的主要理由。TJ1说，“虽然女孩会更加贴心，但是就算你有女儿，老了还是很孤独的。你不仅是跟你的儿女有代沟，你甚至跟这个社会慢慢脱

节，无论你生男生还是生女孩，你要做的就是，尽量的跟你另一半走下去，有自己喜欢的东西，过好自己的生活，别寄托希望在儿女身上。”

不仅如此，现在的年轻父母对也可以接受分开居住，以不拖累子女作为最大目标，养老观念的变化深刻体现了这一代“责任伦理”。在他们眼中，自己不可能像上一辈那么不求回报地为儿女付出，也不寄希望于子女对自己的反哺。“生孩子时从未想过老了以后要他养我。我想着自己养自己，不拖累他们，可能因为我自己也帮不了他们太大的帮助，我能做到的就是不拖累他们。”（LKX6）

“我想的挺开的，就是他如果希望跟我一起住，那我们就一起住，如果他觉得他工作也忙，我就去养老院继续快乐过日子，没有必要一定要那种传统概念里面的儿孙满堂。”（TJ4）

“如果孩子孝顺，那生男生女生都好。如果不孝顺，那儿子又有什么用呢？反正我是完全不指望养儿防老，就自己能存点钱就存点钱，就靠自己啊，把孩子当保险，不合理，也不现实。而且现在无论男生女生，结婚后都自己搬出去住，很少跟父母一起住的。”（ZCX7）

“因为现在当家做主的是我们年轻人。我们这一代跟以前那些老人不一样了，以前老人都是无私奉献，他会帮你带小孩，但是我们这一代的想法是你长大了，你别拖累我，我也别拖累你。”（HLSXQ2）

年轻父母即使对子女养老有所求，也已经接受了与子女“相互交换”的方式。“这年头有一句话‘十年看婆，十年看媳’，要看人家（指未来的儿媳）年轻的时候，你帮人家多少，管人家多少，你怎么对待人家的，未来人家才会怎么对待你。这些事情都是双向的。”（SXQ3）

### （3）生儿子对家庭好，生女儿对自己好

年轻父母不会盲目遵从社会环境，对生育也有成本效用的理性考虑。他们全盘考虑生育前后经济、时间、精力与地位等方面，而且权衡对比的不仅仅是个人得失，还包括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

生男孩的效用，突出体现在家庭传承、家庭财产继承与名声面子上。“农村有一句话就是说，生崽好听，生女好命”（LKX06）。“感觉自己家里有个小男孩儿说话有底气，特别是在农村说话的底气也变得很强硬”（ZCX8）。因为生育有社会性，通过生育建构社会关系确认社会自我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生儿子恰恰有这方面的职能。客观而言，它能给家庭带来社区熟人社会中非常看重的“名声”、“面子”等社会资本。

“大部分的财产，就得留给自己的儿子。给了女儿，就好比是把东西给了别人一样”（ZCX8）。“我一朋友的父母是极其重男轻女的，她父母生了两个女儿，她和她妹妹。她爸爸这辈子就是赌博什么的，他说，反正没儿子，我吃光用光没关系的”（LHQ2）。由儿子来继承财产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意味着家族血脉、家族文化有人继承，与传宗接代异曲同工。

女孩的效用则以情感联系、照料支持为主。儿子结婚后，父母常常会有“失去感”，因为“儿子成家后跟父母的联系会更少，会顾自己的家多一点”（LKX1）。但是，“女儿能够给父母带去实际的孝道帮助，对父母做的事也多，所以大家觉得女儿一点都不比男孩差，大家都讲实际。”（SXQ1）

无论是传宗接代、财产继承还是名声面子，都是家庭利益的体现，是对祖先的交待，是社会环境对家庭的评价，这些都是身外的，对父母当下的生活水平、情感认知没有直接影响，是家庭取向的。而女儿所擅长的情感与照料支持则有助于提升父母的生活福祉，是实用的、可感觉到的，是个人取向的。因此，偏好儿子还是偏好女儿，侧面反映了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价值观的角力、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的转型。

在满足了温饱、实现了小康后，生育需求也在更新换代。人们对生育的追求，已越来越摆脱物质的、现实的层面，不是为了尽道德责任，也不是为了社会声誉，体现为对自我实现的满足，对日常生活中幸福的情绪体验的追求。这使得生育决策中“功利主义”的色彩逐渐褪去。与儿子相比，女儿善沟通，更加体贴父母。这些都成为了女儿的加分项。越是年轻、文化程度越高、越在城市中久居的访谈对象越可能追求现实的利益，这也是他们为什么钟爱女孩的原因。

与父辈价值观的差异在生育与抚育中突显。父辈往往将孩子的成功和幸福作为自己劳作与生命的意义，个人幸福被放在第二位。爱、照顾和家庭资源由上一代向下一代流动转移的。在他们眼中，与子女在一起的大家庭才是“家”，是利益单位，要实现这个“家”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对子女有很强的责任感，希望借由生男孩实现家庭体面。但80、90后父母，既不像父母一样将全部生活意义寄托在下一代，也不想放弃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他们希望平衡好养育子女与个人生活质量，根据家庭经济收入，尽力培养孩子，且不以抑制自己的消费、牺牲自我享乐为前提。为了应对生活压力，他们中很多人选择“功利性”地依赖父母。在子女这里，“家”更多是指与配偶、自己的孩子构成的小家，以小家的利益为出发点。传统的孝道、对子女的责任感与个体主义在这一代年轻父母处交融和杂糅。

### 3. 农村社区没有男孩的集体压力促生了生男意愿

在这些地区，有儿子的家庭是常态。“生儿子优于女儿”成为不用言说的共识，男性偏好有许多隐性的表现，比如猜测孕期妈妈肚子里的宝宝时，总说是男孩，是因为大家都觉得猜测男孩会让孕妇及她的全家高兴。性别鉴定发现是男孩，也会送给医生更大的红包。浙江温州的LHQ2说：“这边的习俗、邻居、各种圈子的人，尤其是老一辈的，会觉得只要生下来儿子就是好的，女儿生下来就是没用的。而且，他们并不觉得重男轻女是个丢人的事，而是觉得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可以大言不惭”。一些重男轻女的习俗给生男孩的人家带来荣耀，另一方面也给没有儿子的家庭带来压力。“无丁债”甚至比贫困更加脸上无光，那些只生女儿的妇女因此受歧视（关秀芳，1997）。访谈中发现，生儿生女还关系到房子的风水，如果整个楼都生女儿，没有生出儿子来，这样的房子都会认为风水不好。

“如果生了一个男孩，就不用面对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追问。如果你只生一个生了个女孩，特别在我们这些农村地区呀，都会说，哎呀，要生个儿子啊什么的”（LKX06）。一位女性受访者说：“小时候回老家，亲戚邻居看见我是女的，都会问弟弟呢。”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能否生儿子成为女性能力的标志。有些强势的男方家庭甚至要等女方生完男孩后才办婚礼（LKX2）。只有女儿的家庭成为少数，没有生育儿子的女性压力很大，尤其在农村地区。

没有儿子的家庭被排除在家族活动外。“没有生儿子的那些媳妇不能去拜祖先”（LKX06）。“假如你只有女儿的话，扫墓啊那些家族活动，都不让你去，就有到这种程度，别人会看不起啊，我



们自己读书出来就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可是一回到那个地方去，就觉得没有女儿还是会有压力的。”（TJ8）

不仅在家族中低人一等，在农村邻里相处中也会被人欺负，在村子里没有地位。“他们乡下那边如果不生个儿子，祭祖的时候就没有男丁去抬什么乳猪、抬那些重物，在村里边呢，说话你就不敢大声说，你做点什么事情，人家说你，你都不敢抬起头来。这一辈子都会被人瞧不起的啊！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啊，乡下哪一户没生到儿子的怎么被人欺负。”（LKX09）

ZCX5从江苏远嫁到广东农村，一胎生了女儿，二胎又生了女儿。“婆婆一点儿笑容也没有，不帮忙带孩子。有一次公公从外面回来脸色特别难看，估计被别人笑话没有孙子了，火气发给婆婆。他们不敢吵我老公，我老公不吃这一套嘛，就在院子里说话特别大声，故意说给我听。邻居那些老太太没事坐在那里三五扎堆的啊，就讨论干嘛了？说那些话，谁家的媳妇谁家的孙子孙女干嘛，在那里说说说说。我不喜欢这样的。”她不想再生，但又希望满足公婆的愿望，备孕非常纠结。一方面为自己成为“生育机器”愤怒不平，但又一方面她没有工作，与公婆抬头不见低头见，在这个家庭中需要寻求稳定感。娘家母亲也说：“你一个人嫁这么远，万一没有儿子，以后你老公变心了怎么办？”她最纠结的是，“如果第三胎怀上检查是女胎的话，要还是不要？如果说不要的话，但是我肯定舍不得了，觉得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又觉得伤身体，但是又想要一个男孩儿，就很矛盾。”

没有儿子的压力在农村熟人社会中格外突出，在城市地区好一些。同样在压力之下，有些女性能顶住压力，坚持己见，有的则争取到了丈夫的支持。“我老公也不愿意我那么辛苦生二胎，他就帮我扛下了来自我家婆的压力吧。说实话，没有我老公扛的话，我是扛不住的”（TJ6）。女性经济是否独立自主、有无来自丈夫与娘家的支持在能否顶住家庭生儿子压力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 4. 女性视角的孩子性别偏好

女性是生育事件的直接承担者，也是孩子的主要照料者。随着女性在家庭中话语权的上升，女性的性别偏好直接影响着生育决策。一些女性会考虑自己女性的身份来照料不同性别孩子，是否有利于孩子形成相应的性别气质。这种以孩子利益为出发点，体现了这些女性“孩子至上”和完美主义的追求。不少访谈对象希望在子女照顾上亲历亲为，“父母的缺席会造成很多的遗憾，成长的那个过程是只有一次”（SXQ3）。精细化的照料方式不仅使她们因精力有限放弃了多生，也因此影响了她们对生男生女的想法。

男女存在不同性别特质，女性认为自己作为孩子的主要照料人，更具备养育同性别的女儿的能力，而男孩精力太旺盛，不好管教，需要父亲更多地参与。“男生的话，就要让我先生多带一点，我不能经常带，因为我很怕把他培养成一个非常黏妈妈的男孩，这种妈宝男我不太喜欢，还是要培养他男子汉的性格”（LKX04）。此外，对养育男孩缺少信心导致一定的女孩偏好。“我更想要女儿，能感受到身边人都喜欢男孩，我也觉得女孩很可爱。但如果给我一个男孩，我不知道怎么来照顾怎么来保护，怎么来教育，我不懂。因为除了我爸，就没有其他人。再加上我跟我爸相处的之前又不是太和谐，所以不太想生个男孩”（LJ4）。公共场所中缺少家庭友好的设备设施，使女性作为主要照料人感

受到与孩子性别不同带来的麻烦。“如果是个男孩，我外出带着上厕所很不方便。”

有女性认为，有女儿能帮助丈夫真正成熟起来。TJ5说“我想要女儿，我觉得对于孩子爸爸来说，如果是女儿，他更容易从一个男性或者说一个丈夫的角色转换成父亲的角色。所谓的异性相吸吧，那种对于女儿的保护欲或者说对于女儿的那种关爱，可以让他更快地适应父亲的角色。”

但是，也有一些访谈女性，因为自己并不擅长“女红”无法培养出优秀的女儿，而产生了男孩偏好。“希望生女儿还是儿子，可能跟父母擅长哪方面有关系，生个女儿就得把她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像公主一样，但我不会扎辫子。我觉得应该把女孩子培养得比较独立，受最好的教育，又不缺爱又比较精致、细心，所以对女孩子养育的要求会更高一些。男孩子我可能会胜任一些，所以我应该是更偏向生个男孩的。”（LJ2）

除此之外，女性经历也成为不愿生育女儿的原因，因为身为女性，不仅要承担生儿育女的生理痛苦，还要承担社会上不平等的对待。“女孩没那么大压力，女孩跟着妈妈也好，妈妈也方便带，女孩也听话。但又觉着生个女孩的话太受罪了，结婚生孩子太受罪了”（LJ6）。“还是男孩子比较好，因为男孩子娶了媳妇，还在妈妈身边。女孩子嫁到别人家不知道她生活什么样子，会不会受委屈啊？女儿还得去经历生孩子的痛苦，我觉得还是男孩子少担心一点，不管是穷富，都在自己跟前。”（ZCXSQQ1）

“生个儿子可以母凭子贵，整个家庭、整个家族对你的看法，都不一样”（TJ2）。一些女性由此反思，依靠“生儿子”来提升家庭地位实际上是女性的悲哀。TJ3反思道，“我身边有一些女生，生了两个女儿，就说一定要生个儿子，好像生了个儿子就很能够出一口气，因为大家觉得生女儿被看不起啊。但说实话，有这种重男轻女的想法并且付诸实践的女生其实更可悲。因为她很天真以为，只要生了个儿子，大家对我的看法就会改变，能够改变你的地位，这想法其实挺愚昧的。”无论男孩女孩，重要的是自我认可，“男孩跟女孩天生就有不同，但是不代表他们性别不一样，以后社会地位上就一定有很大的差距，还是要去奋斗啊”。

女性的家庭角色以及角色规范也抑制着女性生育男孩的意愿。在这些地区仍有婆婆帮忙带孩子的传统，这种隔代抚幼的压力让访谈女性避之不及。“如果他要是娶老婆了，他有孩子了，你还要帮他带孩子，我会觉得好惨哦！”（LKX04）。LJ5也结合自身经历，认为“婆婆”是个棘手的角色，婆媳关系不好处理。“我有一个儿子，这意味着以后我要当婆婆。当婆婆不好，当丈母娘比较好，我想当丈母娘。我婆婆其实对我非常好，但是怎么说呢，对你再好，婆婆跟妈妈还是不一样的。你不喜欢的事，对妈妈就直接说，但对婆婆没办法这么说。婆婆明明已经掏心掏肺的对你好了，但儿媳妇还是不满意，还是不可能十全十美。”

不难发现，在生儿还是生女的问题上，除了儿女的成本效用关系外，女性还会结合自己的女性经历、对女性家庭角色规范的认知来构想自己成为母亲、祖辈的场景，由此产生出初步的性别偏好。不排除以上这些女性立场的解释有“自我证明”的意涵，她们有可能在为自己的偏好寻找理由，但这些解释丰富了以往的研究，进一步提示，年轻夫妇的性别角色认同不仅影响他们对不同性别孩子的教养方式，也将助长生育性别偏好的形成。

### （三）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技术的可获性较高

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技术在这些地区可及性较高。广东与香港相邻，许多人将孕妇血样送香港鉴定胎儿性别，福建、湖南以及浙江的访谈对象都谈起当地有送检香港的渠道。这些渠道长期存在，且费用不高。

除了将血样送香港化验外，超声波技术在私人诊所甚至公立医院用于鉴定胎儿性别。公立医院清晨或夜间不出诊的时间是鉴定的好时机。有些医生不直接说，隐晦地表达，而这些孕妇的家人则会呈上“红包”以示感谢。“B超接单500块钱测男女，四个月以后测就会便宜一点。还有那种私人医院，可以照四维的。四维特别贵，要一两千块钱。贵在暗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LHQ2）。B超鉴定胎儿性别技术在相对偏远的乡镇的可获性更高。LKX9的婆婆多次提示，城里不方便做的话，回老家在农村做很方便。

SXQ1表示，2000年到2015年间，做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人工流产的很多，因为在深圳生活，经常有内地的朋友向她打听，“就是二胎政策放开之前，生二胎的都是想生儿子的，就会去照，因为他们冒着罚款的风险，想要一个自己满意性别的”“广州、深圳一带的人，到香港进行性别鉴定很方便，10年前有人专门做，帮人带把血带过去做化验，相当于代购一样的，他是搞代验。后面国家抓嘛，不允许，但也有人做。也可以孕妇去香港短期旅游做，前几年去香港的人特别多，很多人是去化验的。因为刚怀孕一两个月根本看不出来，他们直接去就不用让人去带。不过这几年受香港动乱和疫情影响很大，应该直接去的少了。”

性别偏好是使用这些技术手段的主要动机。访谈的年轻女性并不都支持使用这些技术，比如LJ3明确表示不会做性别鉴定“因为觉得没有意义，难道是男/女就要拿掉吗？只会增加孕期的不痛快而已，和你预期一样还好，若是相反那会更难受”。而一些女性则认为，性别鉴定是一回事，她们从内心并不非常排斥甚至期待提前知道性别，但是如果为了性别选择目的去鉴定，又表示出强烈的不接受（ZCX SXQ3）。

但那些父代有强烈生男愿望的，还有一些本身希望生出男孩的女性会寻求这种技术的帮助。访谈的47对夫妇中有42对已育或现孕，其中有8对做过胎儿性别鉴定，有3对分别做过2次。2人次抽血送香港检验，其余均为B超。做性别鉴定的访谈对象知道鉴定是不允许的，一些还是公职人员，但没有人被发现或受到处罚。由于执法没有产生威慑力，大家就认为是平常的生活实践，心照不宣继续做。没有亲自实践过的访谈对象都有朋友亲属做过，一个合理理由是“好知道怎么给孩子买衣服”。

性别鉴定创造了性别选择的可能。访谈中11个鉴定过的胎儿中，7个为女胎，但都没人工流产。4个表示原本就无所谓性别，只是想提前知道。1人出于不舍，2人因为妊娠周数已大，担心影响健康。所有经鉴定的男胎都生了下来。这11个胎儿中，5个是二孩，4个是一孩，还有1位是三孩。LJ7是位三孩的爸爸，老大顺其自然是女孩，老二做了B超为女孩，但月份较大没有人工流产，怀了老三后，他亲自开车送妻子去香港做了检测，终于如愿以偿生了男孩。如果只有女孩，则孩次越高越可能进行性别鉴定，即一孩随意，二孩可能要鉴定，三孩一定要鉴定。越到高孩次，不通过性别鉴定与人工流产，越可能无法拥有男孩。

对男孩的需求还产生了怀孕之前的生男偏方。“这边也有几家诊所特别有名，就毅然开在大街上，喝那种中药就可以生男孩这种，没听说有生女孩的偏方”（LHQ2）。“她（我婆婆）肯定（想要男孩），她给我发来一个方子，让我去药店里面买那些药，然后配起来泡酒，叫我喝”（ZCX6）。“那个中药呢，其实是为了调理我们双方的身体，希望能够尽量生一个儿子的。那个医生他也不能100%保证的嘛，我们看中医吃中药都花了快十万块钱了，很贵的”（LKX09）。这些中医偏方的生男成功率较高，在人群中口口相传。

胎儿性别选择的人工流产与性别鉴定一样也不难实现，不仅有地下诊所，也可以直接去香港手术。LHQ2的邻居一胎是女儿，二胎又怀了女儿，她自己坚持人工流产，连她婆婆都认为没必要，第三胎再生男孩。“但是她不愿意，就想生两个，反正一儿一女二胎必须有儿子，不然就不生了。她觉得痛是一时的。再生个女儿，觉得没必要。”LKX9有个生了两个女儿的堂姐，在婆婆“你要是不生个儿子出来，我死不瞑目”的压力下，相继做了2次胎儿性别选择的人工流产，仍然未能如愿。“那两年的时间她（指堂姐）什么办法都尝试过了。她真的尽力了，现在40来岁了也不想折腾了，她说再折腾就把命都搭进去了。”

辅助生育技术成为满足群众生育意愿的技术手段。但访谈对象告诉我们，至少在国内，在使用辅助生育技术中选择胎儿性别，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些手术是否成功，最看重是胚胎的存活能力，性别反而是其次的。但是，访谈对象声称在泰国可以选试管婴儿的性别，民间也有相关的渠道出国接受这类服务。

卫生健康委干部在座谈会上也反映，目前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与非法胎儿性别选择（简称“两非”）的管理难度很大。2005-2018年间，政府对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十分重视，各级成立了由政府各部门构成的领导小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纳入了工作考核。“打击‘两非’”是重点抓手之一，主要措施包括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管理、对群众的警示教育、开设群众举报热线以及与公安纪检等部门的联合取证办案等。但在2018年以后，由于机构调整与职能处室并减，原计生基层工作网络明显弱化，出生性别比治理工作被边缘化，未被纳入工作计划与没有相应考核，工作力度已明显削弱。

目前广东省一些地区还在继续打击“两非”。由于港澳台采血送检行为增多，广东省在2019年联合海关、邮政等17个政府部门，专门下发了《打击防控采血鉴定胎儿性别行为和整治“两非”专项行动的方案》。茂名的高州市与湛江的雷州市都延续群众有奖举报制度，每例奖励2万元。近些年，还都处理了零星的案件，主要是使用便携式B超机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开展地下人工流产的案件，都对涉事的机构和人员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处罚金、逮捕或取消行医执照。雷州市市级财政每年拨出专款十万元作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专项经费，并将打击“两非”工作纳入市委市政府政策重要工作日常和重大督查事项。

这些地区仍在开展医疗机构的警示教育、媒体宣传以及对14周以上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的管理。在高州市，14周以上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与引产手术必须要有两位副主任医师，根据明确的指征，经检查确诊并签字后，才可以施行手术。

这些干部也坦言，目前的“两非”案件手法十分隐蔽，取证查处非常困难，而且现有的管理措施对公立医疗机构有效，私立民营医疗机构则难以管理。雷州市卫生健康委的干部说“这些都是高利润的，他玩我打击他，他就有所收敛一下。过后呢，他偷偷来搞。我们肯定杜绝不了的。不过打击肯定对我们的性别比偏高治理有帮助的。”

#### （四）多生成为除胎儿性别选择外满足性别偏好的另一路径

多生成为除胎儿性别选择外满足性别偏好的另一路径在男孩偏好作用下，由于生育数量减少，为了在更少的生育机会下生育男孩，势必增加胎儿性别选择。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群众对政府生育政策的博弈（李若建，2005）。而生育政策的放开允许家庭有更多的子女，取消了外部政策限制，生育回归为家庭内部的自主决策。

除了湖北之外，2020年，这些省份的总和生育率均高于1.3的全国平均水平，广西的总和生育率1.94位居全国前列。历史上看，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与海南也是生育率长期较高的省份，群众对生育政策的变化高度敏感，也是响应“全面两孩政策”、“三孩政策”最为积极的地区。

当然，在这些地区，受社交媒体等影响，现在已婚未育的夫妇也会提前感知到生育的不易，因为社交媒体、网络上时常能听到“要攒多少钱才能生孩子”，身边朋友分娩的痛苦、产后抑郁等的渲染，都会加剧他们的恐生心理。已生育的夫妇也感受到了孩子生养的经济压力，也同样面临着时间精力的紧张和没人带孩子的困境。“我的感觉是多一个孩子，多的是负担，多的是压力，多的是累，然后自己完全没有时间和空间了。”（SXQ1）

但是，在这些地区，两个孩子是一种社会氛围，对家庭人气的向往、对儿女绕膝的追求，会形成了一股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大多数抱着“给孩子找个伴”的想法生育二孩，但不一定强求孩子性别。他们对标的是“政策允许生几个”。如果生不够，那就还有“政策余额”，再生育借着政策的出台成为一件崇高且有使命感的事。

“我觉得生育很有趣，上天给你一个子宫，你一定要用起来”（LKX8）。“生孩子这件事情并不卑贱，以前说是为了生一个男孩，传宗接代，现在已经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了，在为社会为民族做贡献啊。人口对国家来说这么重要，难道对家庭不重要吗？难道一个家庭的强大不需要人口来做基垫吗？你身边有几个真正的好朋友呢？手足才是真正的能够一辈子那样子去帮衬的”（LJ4）。

生男偏好是家庭再生育的重要动因。没有儿子的家庭要生出男孩，而已有男孩的家庭也可能再生，父代的生育观念是背后的推力。“闽南这边是这样的，我见人蛮多生了两个女儿，然后要生三胎四胎，要拼男孩子”（LKX02）。“我妈觉得最好一胎搞定两个，就是一男一女，以后就封肚子，不用生了。公婆说三胎政策出来了，我最好继续生，生男生女无所谓，因为他是独生子嘛”（LKX04）。

年轻夫妇对人工流产的接受度不高，也使多生成为较性别选择更合适的选择。对生命的尊重、对女性健康的保护是拒绝人工流产的主要理由。二胎有许多是意外怀孕后出生的。许多女性都谈到对腹中胎儿的不舍，正是这种天生的“母性”让她们下不了决心。“二胎的话，我其实是意外怀孕，那时候想过打掉，但是我不敢。尤其在听到胎心跳动的那一刻，就会心软，尤其当妈妈的。这是一个小生命啊，你就这样子去把它摧毁掉，有点太残忍了”（LKX02）。三孩政策也促成了一些家庭意外妊娠后再生育。

她们大多都认为人工流产对身体的伤害很大，甚至大于分娩“我们这里有一句话叫流一生七。我妈妈说，流产一个孩子对女性带来的伤害，相当于生了七个孩子带来的伤害。无论怎么样都不要去流产，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LKX09）。丈夫在人工流产的决策上也发挥重要作用，无论留不留下孩子，他们多是委婉的、旁敲侧击的，站在维护夫妻情分的立场上。“我当时知道意外怀孕了，就想着不要了吧，但我老公不愿意，他说如果堕胎的话，那以后会影响到我的身体，他说他负担不起这个责任。”（LKX04）

## 七、讨论与结论

### （一）年轻一代男孩偏好弱化但生育行为受父代的影响

#### 1. 年轻一代男孩偏好弱化，与父代形成鲜明反差。

目前生育高峰人群是80、90后人群，他们的生育性别偏好呈现出多元谱系。他们追求儿女双全，男孩偏好已明显减弱。“必须要有男孩”的观念已经淡化，无偏好或女儿偏好在增多。即使仍偏好男孩，也表现为“有男既可”，而非“男孩越多越好”，甚至还有一定的“两男恐惧”。他们一方面不愿意有很多男孩，另一方面能接受女孩，让更多的女孩出生，男孩数的减少与女孩数的增多导致出生性别比的缓慢下降。无论偏好什么，他们都不会在儿子与女儿的后天抚养与教育上厚此薄彼，出生后虐待女婴的现象已消失，呈现出可喜的进步。

相比之下，父代的男孩偏好仍然较为强烈，表现为一定要有男孩，甚至男孩数量越多越好，尤其是男方的父母。两代人的差异反映了价值观的不同，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生活环境与个人经历的差异共同塑造的。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代际差异无可厚非，但在这些省份，两代人在生育问题上的博弈格外突出，生育成为两代人之间的“拉锯战”。代际关系也成为考察这些地区性别偏好与相关行为时必不可少的视角。

#### 2. 传统家庭伦理及“孝”文化一定程度上促推了生男行为

在这些省份，传统家庭伦理与“孝”观念格外深入人心，生育不仅是夫妇的事，更关系着大家族的繁衍。父代看重子代的生育行为，子代也在意父代的意见。同时，中国的生育支持政策都不完善，生育及抚幼的压力主要落在家庭层面。子代要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中立足，要履行好生育职责，不得不依靠父代的支持。这使得代际间互动相对紧密，资源由父代向子代流动和倾斜。

父代通过与子代的经济牵制、情感互动加大对子代生育行为的影响。尽管不完全认同父代的观念，大多数年轻夫妇倾向于按照父辈的意愿生育男孩，作为对父辈的交待。但他们同时期待父辈继续提供经济与抚幼的支持，来减轻自己小家庭的育儿压力。代际间存在着交换：子代以满足父辈的生男愿望来换取父辈的经济与照料资源，维系父子关系的和睦。子代在生育上的妥协并不仅是个人意愿，而是应对生活压力与育儿支持不足的家庭策略。这一方面深刻反映了中国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家庭文化与观念的持续影响，另一方面也突出说明了家庭应对生育养育资源冲突具有现实性与权宜性特征。

## （二）男孩偏好的社会文化原因并未完全消失

### 1. 男孩偏好的社会文化土壤还相当深厚

这些省份经济虽然相对发达，但男性优先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获得资源。传统性别分工渗透在社会与家庭生活各领域，尚未发生根本改变。社会上男强女弱的性别刻板印象有所改变，但没有根本改变。

父权制的影响在这些省份更加深远，受到父系继承的影响，男性还是一家之主和传宗接代的人选。在家庭成员界定上，仍然儿女内外有别。在传统习俗比如祭祖、家谱、满月庆祝活动中，儿子与女儿还区别对待。在农村，有没有儿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在村子里的地位。传宗接代、提高家庭在社区中的地位是想生男孩的主要原因，这些原因都体现了儿子的名义价值而非实用价值。

家族主义文化影响这些省份仍十分强劲，家庭凝聚力强，亲属间的互动较为频繁。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口，受城市环境的浸染及家乡文化的影响，性别偏好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在城镇，人们没有完全脱离乡土社会，还是半熟人社会，容易受到周围主流生育规范的影响，为从众而生育男孩。

### 2. 社会存在弱化与进一步强化男孩偏好的因素

生育决策从“家本位”向“家本位与个人本位并立”转移，即更多地关注儿女的实用性功能而非名义上的功能，更强调对个人的、小家庭而非对大家庭的利益减损。与此同时，儿子的实用性功能在减少。“从夫居”在松动，养儿防老观念大大弱化。不仅经济上不依靠儿子，甚至也不期待儿子提供养老生活照料。男性的婚姻成本较高，增加了父母的经济压力。这些有助于抑制生男偏好。

女儿的实用性功能在增加，人们逐渐认可女儿对父母的情感支持与照料帮助。但是，新近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女儿婚育成本的抬升，本质上是经济条件允许下，娘家通过经济投入来提升女性婚后在夫家的地位。这样的做法一旦变味相互攀比，就会加大了女儿父母的经济压力，从而抑制男孩偏好的逆转。

## （三）男孩偏好向行为转变的现实可行性较强

### 1. 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技术在这些地区可及性强

凡是与“生男”相关的技术手段在当地都有很大的需求。这些技术手段满足了怀孕不同时期的生男需求，人们对应用这些技术予以理解。

技术提供方的隐匿甚至半公开的存在使得这些省份更有可能发生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行为。以广东省作为重要中转地，其余省份将孕妇血样通过广东送检香港已形成专业化的运作。私营医疗机构以及公立医院都可以暗地提供超声波鉴定。乡村与镇地区的技术可获性更高。这些技术使用更加隐蔽，增加了查处的难度，另一方面，政府的相关管理力度在减弱。较大的需求、地理交通的便利性以及费用的可负担性决定了这些技术应用的普遍性。由于抽血进行鉴定时的妊娠周数小，也为性别选择的人工流产创造了可能。

虽然技术可获性较大，但年轻夫妇对人工流产的接受度在下降。在鉴定为女胎后，一些女性往往纠结胎儿伦理，且不愿意轻易牺牲个人健康，体现了女性对身体的自主意识。女性对人工流产的抵制成为减少胎儿性别选择的一个有效路径。这一抵制也促成了多生，无论是否出于胎儿性别的考虑。

## 2. 实现男孩偏好与生育数量仍存在竞争关系

生育数量与性别偏好的关系决定了有男孩偏好的人群，是否会以及在什么时候实施性别选择，从而决定了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低。生育政策放宽缓解了生育数量与满足性别偏好之间原本紧张的冲突。多生孩子可以在不实施性别选择的前提下满足男孩偏好，两者相得益彰。总的来看，目前在这些省份的确有部分人群可以通过多生，实现生育数量与性别偏好的双赢，但竞争关系仍然存在，冲突的类型从“外在的”转为“内生的”。

由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上升，年轻夫妇的生育决策更趋理性，意愿生育数量虽然不再受到政策的限制，但家庭经济条件、时间照料资源的约束更加突显，意愿生育数量趋向减小，城市地区尤其如此。在父母的压力下，在有限的生育数量内，要满足家庭的男孩理想，始终要面对着胎儿性别选择人工流产与多生的两难选择。

在竞争关系下，如果只想有一个孩子，很可能选择一孩的性别，导致一孩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异常。如果只想有两个孩子，一孩为女孩，第二个孩子大概率要选择。如果一孩为男孩，二孩就随意。二孩出生性别比的普遍回落应该与生育二孩人群一孩男孩比例较高相关，是生育政策放宽的收益。同理，多孩性别比的居高不下，与生育三孩人群的子女性别结构相关。两个女儿的家庭最有可能多生，且三孩进行选择的可能性最大。“生男即止”的原则在各个孩次都起作用。

### （四）赋权女性、促进男性观念转变的作用突显

女性是男孩偏好与胎儿性别选择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性别选择的决策者、承担者与生育抚育行为的主要承担者。身为母亲的女性从养育要求、未来的家庭角色规范来分析生儿生女对自己的影响。她们更易在照顾女儿上获得性别的共鸣，也惧怕未来“婆婆”这一角色规范。不排除一些女性也会偏好男孩，但总体来看，性别意识与家庭地位的提高，让女性从自身利益与喜好出发，更愿意生女儿，也希望女儿能摆脱传统性别文化的束缚。

同样，年轻女性的性别认同及自主性是决定性别偏好是否转化为性别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高、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女性男孩偏好较弱，有相对较高的家庭地位，也敢于坚持己见，策略性地与长辈抗争，她们更重视自己的健康，越不会无原则地接受胎儿性别选择的人工流产。

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丈夫可以成为妻子坚强的后盾，挡住来自长辈的压力。反之则会成为性别选择的帮凶，在家庭内进一步制造性别不平等的环境，让这种不平等代代相传。生育决策权最终在夫妇，夫妇性别偏好的一致性以及相互支持是避免胎儿性别选择的重要前提。



## （五）出生性别比变动呈现显著特点

出生性别比状况是性别偏好、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技术可获性综合作用的结果。这8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虽然仍在高位上运行，但与全国一样都已明显下降。这些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与全国有同有异。首先，和全国一样，城市、镇与乡村的出生人口性别进一步趋同，但从水平上看，2020年镇的出生性别比仍然异常偏高。第二，与全国二孩出生性别比已回归正常不同，这些省份各孩次普遍偏高，一孩性别比不降反升。二孩性别比也在下降，但不同省份下降速度不同。多孩性别比都在120以上，甚至达到160多。这说明，胎儿性别选择现象在这些省份普遍存在。第三，与全国不同，这8个省份镇的一孩出生性别比上升，海南、广西、江西与湖南镇的一孩性别比都在120以上。可见镇出生的一孩相对高发胎儿性别选择行为，原因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省内部分地市的高性别比也导致了整个省性别比的异常偏高。这些异同进一步说明，理解这些省份的性别比既不能脱离中国人口变动规律，也需要结合这些省份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

## 八. 政策建议

较强的男孩偏好加上较为便利的技术手段，共同造就了这些省份持续偏高的性别比。既要看到这些省份整体出生性别比在回落，男孩偏好在弱化，但也要看到，男孩偏好转变与出生性别比下降速度低于预期。2020年，广东、福建、江西、广西与湖南均没有完成各省《2017-2030人口发展规划》中设定的202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目标，分别为111、113、112、112与111.5。究其原因，文化与观念转变所需时间较长，近年来政策措施弱化都不无关系。由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1. 坚持对出生性别比的综合治理与长期治理。

政府重视、综合治理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中国经验之一。现阶段出生性别比尚未恢复正常，仍需要政府继续重视。减弱男孩偏好的社会经济因素不少，但家庭、文化因素成为男孩偏高续存的主要原因。这提示，治理政策的重点内容与策略需要与之前的遏制上升阶段有所区别。

出生性别比的治理需从长计议。文化的变动总是滞后的，文化与观念的转变更需要做长期打算，要重视对性别比治理的中长期规划，避免急功近利的看法。要采用“柔性治理”的思路，使用“润物细无声”的策略。

认识到性别比偏高已成为一个区域性问题的，需要坚持在这些依旧偏高的重点省份开展工作，坚持多部门合作与综合治理。要落实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协作。要突出重点，鉴于这些省份在镇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偏高，要加大对乡镇的治理力度，以乡镇出生的一孩为重点对象，要加大文化引领与舆论营造工作。

### 2. 推进公私领域的性别革命，坚持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男孩偏好的产生根源于“儿子优于女儿”的价值判断，根源在于女性相对男性的经济、社会劣势地位。在这些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省份，经济发展并未与性别平等同步。要减弱男孩偏好，迫切需要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妇女权益保障法》，提高女性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话语权。

要加大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宣传与落实。进一步提高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增加女性经济收入，保障女性财产权益。要在农村土地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保障女性平等享受集体收益分配权，特别要保障出嫁、离婚、丧偶女性的合法权益。

加快推进家庭领域的性别革命，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改变“儿子是自家人、女儿迟早要离开家”的观念，宣传女儿也是传后人，女儿也具有财产继承权等。增加对不同的家庭性别分工模式的包容，肯定女性对家庭的贡献。要保障女性身体权特别是对生殖行为的自主权。

### **3. 推进传统习俗的变革，构建新型婚育文化**

在这些地区，重男轻女的传统习俗是男孩偏好强势保留的文化基础。建议对传统习俗进行梳理，保留其中积极向善、有利于家庭团结、性别平等的内容，去除其中性别歧视的内容。在红白喜事、祭祖、上家谱等活动中确保男女平等，不因自身的性别或有没有儿子而区别对待。

建议联合农业农村部、民政部、全国妇联，将构建新型婚育文化与乡村振兴、乡风文明建设有机结合，通过村民自治、居民自治章程修订等，在乡村、社区鼓励婚俗改革，婚事简办，彩礼与嫁妆的多少应与当地的经济水平和发展水平相匹配。推进婚居模式变革，鼓励男到女家落户，有儿有女家庭也可以招婿上门，鼓励年轻夫妇“两头住”。儿子与女儿共同赡养老人，丈夫与妻子共同抚养双方父母。

### **4. 以男性与老年人为重点，加大性别平等宣传。**

在孝道影响下，满足长辈的生男偏好是当前年轻夫妇“多生”或“选生”的主要原因。转变老年人的生男偏好，将对减少胎儿性别选择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在这些省份，建议要加强影视文化作品的性别审查，以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组织文化传播活动，比如在社区大讲堂、老年课堂等加入性别平等、家庭和睦的理念，宣传身边家庭女儿成才、孝敬父母的案例。要向老年人广泛宣传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的危害。

建议利用短视频、微信、微博等网络化方式，加大对男性的性别平等倡导。一方面要借势趁机，宣传女儿对家庭、父亲的积极价值，强化女儿也是传后人的观念。另一方面要引导丈夫更多地参与家庭育儿与家务，关心关爱妻子与孩子成长，自觉抵制胎儿性别选择。

要深入开展家风与家庭文明建设，深入讨论新时期“孝”的新内涵，鼓励两代人在生活上互助互爱，建立平等与相互尊重的代际关系。

### **5. 加大对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技术的管理。**

在这些地区，建议要加大对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选择与性别选择的打击力度，健全执法机构与人员。继续加大对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的管理，尤其要加大对镇、乡村地区、私立民营医疗机构的监管。要加强警示教育，依照法律法规严惩从事相关行为的医疗人员与医疗机构。加强手机软件、网络上相关广告的监管，与海关、公安等部门通力协作，严查孕妇血样跨境运输，对协助他人赴境外开展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的人员也要依法依规惩处。

严格对14周以上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的管理。无论是不是出于胎儿性别选择的目的，人工流产都对女性健康造成伤害。建议加大宣传生命伦理，客观介绍人工流产的利弊，强调14周以上人工流产的危害。严格人工流产手术的技术操作规范，保障人工流产女性的健康。对人工流产的管理始终要以保障女性生育自主权和身体健康为出发点。

加大对育龄人群“非医学需求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技术违法”的宣传。与妇幼保健与孕产机构紧密协作，利用孕产保健服务的时机，开展宣传教育，以生育三孩及以上的家庭为重点。

## 6. 加快建立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发挥当地生育文化的积极作用

这些地区的生育文化中，重男轻女的内容应该摒弃。但其重视家庭、崇尚儿女绕膝的观念实际上有利于提升低生育率，也有利于加大家庭支持，缓解家庭养老、托幼等现实矛盾。要客观认识到，在中国进入超低生育率水平的背景下，减轻生育、养育与教育成本虽然能减少生育的外在制约因素，但从个体、家庭以及社会的层面赋予生育正向的意义更为重要。

有偏好是正常的，但因为偏好而出现群体性的性别选择是不正常的。退一步讲，如果只是从感情上偏好男性，不实施胎儿性别选择，不在出生后歧视女孩，只是为了满足性别偏好的“多生”行为，实际上有助于提升生育率，保持当地的人口繁荣，同时又有助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实现“双赢”格局。当然，破除长期以来的性别不平等，努力纠正“一面倒”的男孩偏好，更多人呈现出“偏好女孩”与“无偏好”，这是需长期努力的目标。

建议梳理这些地区生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积极的内容进行提炼总结并广泛宣传。同时，要加快完善这些地区的生育友好政策，加快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建设，鼓励亲代协助子代托幼，鼓励邻里互助，可以进一步消除育龄人群生育的后顾之忧，促进人口在数量、结构上长期均衡发展。

## 参考文献

- [1] Almond, Douglas , and E. K. Milligan . "Son Preferenc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Culture: Evidence from South and East Asian Immigrants to Canad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3. 39.1:75-95
- [2] Dubuc S , Coleman D D . An Increase in the Sex Ratio of Births to India-born Mothers in England and Wales: Evidence for Sex-Selective Abortion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7, 33(2):383-400
- [3] Ebenstein, A., and S. Leung, Son Preference and Access to Social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Rural Pension Program,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0.36.1: 46-70
- [4] [美] Mark Granovetter,梁玉兰译。作为社会结构的经济制度：分析框架[J]。广西社会科学2001.3
- [5] Qian, N. (2008). 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 The effect of sex-specific earnings on sex imbala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123. 3: 1251-1285
- [6] Tavassoli, Nahid. The Transition of Son Preference: Evidence from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ECONOMICS*. 9. 43-67. 10.2478/eoik-2021-0010

- [7] W. Xiong. Dynamics between Regional Sex Ratios at Birth and Sex Ratios at Prime Marriageable Ages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22.48.2
- [8] Wei. S. & X. Zhang,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1a. 119. 3: 511-564
- [9] Wei, S. & X. Zhang, Sex Ratios,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16800. 2011b
- [10] 陈凤金。生育选择与乡土文化[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9
- [11] 董惊乔。中国女性性别平等意识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GSS2015调查的实证分析[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7(04): 77-81
- [12] 费孝通。生育制度[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5):228
- [13] 风笑天。给孩子一个伴: 城市一孩育龄人群的二胎生育动机及其启示[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8(04):57-65
- [14] 葛佳。从“生儿子”到“生个伴”——农村富人的二胎生育实践[J]。南方人口, 2015, 30(05):1-9
- [15] 关秀芳。“丁崇拜”对广东妇女生育观的影响[J]。人口研究, 1997(05):74-77
- [16] 黄少宽, 黄晔。性别偏好研究——潮汕地区一个村落的实地调查[J]。南方人口, 2007(04):13-18
- [17] 侯佳伟, 顾宝昌, 张银锋。子女偏好与出生性别比的动态关系: 1979—2017[J]。中国社会科学, 2018, (10):86-101+206
- [18] 江立华, 熊凤水。农民生育中的生男偏好: 价值合理性行动——基于皖南H村的实证调查[J]。江淮论坛, 2007(06):96-100
- [19] 李冬莉。经济发展和家庭制度变迁对农民性别偏好的影响: 三个模式的比较[J]。妇女研究论丛, 2001(03):21-28
- [20] 李慧英。男孩偏好与父权制的制度安排——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性别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 2012(02):59-66
- [21] 李树茁, 朱楚珠。中国出生性别比和女婴生存状况分析[J]。人口与经济, 1996(01):13-18+7
- [22] 李若建。性别偏好与政策博弈: 广东省出生人口性别比时空变迁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3):54-60+125
- [23] 李银河, 生育与村落文化[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4月
- [24] 李涌平。广东客家农民的高生育观念[J]。中国人口科学, 1995(02):44-49

- [25] 梁宏。2000年以来广东省出生性别比的变化及其思考[J]。人口与社会, 2018,34(05):40-51.  
DOI:10.14132/j.2095-7963.2018.05.004
- [26] 刘爽。对中国生育“男孩偏好”社会动因的再思考[J]。人口研究, 2006(03):2-9
- [27] 穆光宗, 陈俊杰。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J]。人口研究。1996(2)
- [28] 欧阳晓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研究的回顾与评析[J]。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 [29] 蒲艳萍, 黄容, 李福莉。房价与生育偏好——来自CGSS的证据[J]。经济师, 2020(05):44-46+48
- [30] 沈艺峰, 陈述。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以企业家子女结构为视角[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1):94-106
- [31] 盛亦男。“男孩偏好”的家族制度影响研究[J]。南方人口, 2012,27(04):8-15
- [32] 石人炳。我国出生性别比变化新特点——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的比较[J]。人口研究, 2013,37(02):66-72
- [33] 石人炳, 杨辉。两男恐惧: 一种值得关注的孩子性别偏好[J]。人口学刊, 2021, 43(01): 15-25.  
DOI:10.16405/j.cnki.1004-129X.2021.01.002
- [34] 汤梦君。家族主义、社会性别文化与性别偏好。女孩的生存环境[M]。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
- [35] 汤梦君。生育性别偏好与出生人口性别比: 变动趋势与地区差异[R]。联合国人口基金、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21
- [36] 许烺光。美国人与中国人: 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M]。华夏出版社。1990
- [37] 杨凡。社会经济发展与男孩偏好的淡化[J]。西北人口, 2014,35(04):8-12
- [38] 杨凡。现代夫妻关系对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 2016(03):11-18
- [39] 杨凡。家庭关系现代化对农村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 2016(03):101-108
- [40] 杨凡。妇女生命历程对其男孩偏好的影响[J]。人口研究, 2017,41(02):17-29
- [41] 张爱华。村落日常实践中的男孩偏好——对河北上村生育偏好的文化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 2016(09):162-167
- [42] 张川川, 陶美娟。性别比失衡、婚姻支付与代际支持[J]。经济科学, 2020(02): 87-100
- [43] 张川川, 马光荣。宗族文化、男孩偏好与女性发展[J]。世界经济, 2017,40(03): 122-143

## 附录

附表1 8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及相关社会、经济、文化及家庭特征

	地区	性别比	人均GDP(元)	总人口(万)	出生人口(万)	汉族占比	城镇化率	15岁及以上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比例	总和生育率	三代户比例
	全国	111.3	72371	140977	1200.47	91.11	63.90	18.50	1.30	13.26
1	海南	122.4	54881	1008	10.41	84.30	60.27	16.78	1.55	16.56
2	江西	120.3	56853	4519	42.74	99.51	60.44	14.12	1.41	17.73
3	福建	118.7	105691	4154	38.18	97.30	68.75	17.12	1.38	15.28
4	广东	115.5	87899	12601	129.20	96.23	74.15	19.52	1.36	13.62
5	广西	114.5	44199	5013	56.82	62.48	54.20	14.42	1.94	16.90
6	湖北	114.3	75226	5775	95.20	62.89	62.89	17.49	1.17	16.18
7	湖南	114.2	62885	6644	56.64	89.94	58.76	14.96	1.34	15.57
8	安徽	113.1	63380	6103	99.29	58.33	15.19	15.19	1.39	13.26

资料来源：总人口、出生人口性别比、汉族人口占比、女性受教育水平、总和生育率、三代户比例来源于《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城镇化率为2020年数据，来源于各省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人均GDP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附表2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一览表

编码	年龄	性别	婚姻	教育	职业	家乡	现驻地	现住地 城乡	家乡 城乡	子女数	1孩	2孩	3孩
1	ZCX1	25	女	初婚	高中	全职妈妈	广东揭阳	江西上饶	农村	城乡结合部	2	男	男
2	ZCX2	41	女	初婚	本科	教育培训	湖南邵阳	广东广州	城市	农村	2	龙凤胎	
3	ZCX SXQ3	38	女	初婚	高中	超市售货员	广东深圳	广东深圳	农村	城市	2	男	男
4	ZCX SXQ4		女	初婚	本科	工程预算	内蒙古	广东深圳	城市	城市	2	女	男
5	ZCX5	34	女	初婚	高中	全职妈妈	江苏省	广东佛山	农村	农村	2	女	女
6	ZCX6	26	女	初婚	高中	小商品加工	四川省	广东河源	农村	农村	1	女	
7	ZCX7	36	男	初婚	本科	金融公司行政	广东江门	广东广州	城市	农村	1	女	
8	ZCX8	36	女	初婚	高中	全职妈妈	山东济南	广东中山	城市	农村	1	男	
9	LJ1	35	女	初婚	高中	开店	福建福鼎	福建福鼎	城市	城市	2	女	男
10	LJ2	36	女	初婚	本科	英语教师	广东汕头	广东汕头	城市	城市	2	男	男
11	LJ3	31	女	初婚	本科	社工	广东清远	广东清远	城市	农村	1	女	
12	LJ4	30	女	初婚	本科	瑜伽老师	福建厦门	福建厦门	城市	城中村	3	女	男
13	LJ5	27	女	初婚	本科	公务员	福建厦门	福建龙岩	城市	城市	1	男	
14	LJ6	28	女	离异	初中	幼师	河南商丘	河南商丘	城市	农村	1	男	
15	LJ7	38	男	初婚	本科	社工	广东广州	广州增城	城市	城市	3	女	男
16	LKX1	28	夫妻	初婚	本科	男自己创业、女公司财务	广东汕头	广东深圳	城市	城市	0		
17	LKX2	32	女	初婚	本科	全职妈妈	福建厦门	福建厦门	城市	城市	2	男	女

编码	年龄	性别	婚姻	教育	职业	家乡	现住地	现住地 城乡	家乡 城乡	子女数	1孩	2孩	3孩
18 LKX3	30	女	初婚	本科	政府雇员	广东清远	广东清远	城市	城市	现孕			
19 LKX4	25	女	初婚	硕士	无业	广东河源	广东河源	城市	城市	现孕双 胞胎			
20 LKX5	36	女	初婚	母嬰行业	母嬰行业	广东清远	广东梅州	农村	农村	3	女	女	男
21 LKX6	31	女	初婚	本科	社工	广东清远	广东清远	城镇	农村	2	男	男	
22 LKX7	39	男	初婚	本科	公务员	广东河源	广东河源	城市	农村	3	女	女	男
23 LKX8	33	女	初婚	本科	社工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城市	城市	1	女		
24 LKX9	37	女	初婚	本科	社工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城中村	城中村	2	女	女	
25 TJ1	24、30	夫妻	初婚	本科	男工程造价师	女广西南宁市、 男江西	广西百色	城市	乡村	0			
26 TJ2	29	女	初婚	大专	财务	广东云浮	广东广州	城市	乡村	1	女		
27 TJ3	24	女	初婚	本科	检测师	广西南宁	广西百色	城市	乡村	0			
28 TJ4	29	女	初婚	本科	教师	广西南宁	广西南宁	城市	城市	1	女		
29 TJ5	31	女	初婚	大专	社工	湖北	广东广州	城市	乡村	0			
30 TJ6	35	女	初婚	本科	教师	广西南宁	广西南宁	城市	乡村	1	女		
31 TJ7	26	女	初婚	本科	教师	广西南宁	广西南宁	城市	乡村	1	女	女	
32 TJ8	32	女	初婚	本科	药品	广东云浮	广东云浮	城镇	乡村	1	女		
33 HL1	34	女	初婚	中专	个体美容	湖南衡阳	广东广州	城市	乡村	1	男		
34 HL3	34	女	初婚	本科	国企	湖南衡阳	广东广州	城市	乡村	1	女		



编码	年龄	性别	婚姻	教育	职业	家乡	现住地	现住地城乡	家乡城乡	子女数	1孩	2孩	3孩
35	HL2	35	女	初婚	本科	保险	广东广州	城市	城市	1	女		
36	HL4	36	女	初婚	全日制学生	福建漳州	广东广州	城市	城市	1	女		
37	HLXQ1	38	女	初婚	教育	山东淄博	广东广州	城市	城市	2	女	女	
38	HLXQ2	37	女	初婚	国际物流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城市	乡村	2	女	女	
39	HL5	42	女	初婚	全职妈妈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城市	城市	2	龙凤胎		
40	LHQ1	26	男	初婚	幼教	江西井冈山	江西井冈山	城市	农村	2	男	女	
41	LHQ2	21	女	初婚	金融中介自由职业	浙江温州	浙江温州	城市	农村	1	男		
42	LHQ3	37	女	再婚	民政局合同工	江西井冈山	江西井冈山	农村	城市	2	男(初婚)	女(再婚)	
43	SXQ1		女	初婚	销售经理	湖南常德	广东深圳	农村	城市	2	女	男	
44	SXQ2	39	女	初婚	大学	广西	广东东莞	城市	城市	2	女	男	
45	SXQ3	35	女	初婚	养生馆老板	广东东莞	广东东莞	城镇	城镇	2	男	女	
46	LXC1	32	女	初婚	护士	河南平顶山	广东深圳	城镇	城镇	现孕			
47	LXC2	34	女	初婚	全职妈妈	广东梅州	广东深圳	城镇	城镇	3	女	女	男

**附表3 2020年省级地区0岁人口性别比和出生性别比**

	0岁人口性别比	出生性别比	二者差值
北京	108.2	108.3	-0.1
天津	108.7	108.7	-0.0
河北	108.8	108.8	-0.0
山西	105.1	105.1	-0.0
内蒙古	107.0	107.0	-0.0
辽宁	105.8	105.8	-0.0
吉林	107.3	107.4	-0.0
黑龙江	106.2	106.2	-0.0
上海	108.1	108.0	0.0
江苏	109.0	109.0	-0.0
浙江	110.1	110.2	-0.0
安徽	113.0	113.1	-0.0
福建	118.7	118.7	-0.0
江西	120.3	120.3	-0.0
山东	111.9	112.0	-0.0
河南	108.3	108.4	-0.0
湖北	114.3	114.3	-0.0
湖南	114.2	114.2	-0.0
广东	115.5	115.5	-0.0
广西	114.5	114.5	-0.0
海南	122.4	122.4	0.0
重庆	107.9	108.0	-0.0
四川	108.1	108.2	-0.0
贵州	113.1	113.2	-0.1
云南	107.5	107.5	-0.0
西藏	105.4	105.4	-0.0
陕西	108.3	108.3	-0.0
甘肃	107.5	107.5	-0.0
青海	106.6	106.8	-0.2
宁夏	105.7	105.7	0.0
新疆	107.5	107.5	-0.0

附表4 2020年地级市的0岁人口性别比和规模

序号	省	市	0岁人口性别比	0岁人口数(人)
1	海南	儋州市	127.7	11662
2	江西	新余市	127.5	9484
3	湖北	鄂州市	127.2	9907
4	福建	泉州市	125.3	85068
5	湖北	黄石市	124.3	25086
6	山东	枣庄市	122.8	34250
7	海南	海口市	122.6	28977
8	江西	鹰潭市	122.5	11007
9	江西	宜春市	122.3	48225
10	福建	三明市	122.2	22540
11	江西	上饶市	122.2	62320
12	广东	云浮市	121.9	28846
13	海南	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	121.8	52909
14	江西	九江市	121.5	40722
15	江西	吉安市	121.2	46725
16	福建	莆田市	120.8	28301
17	福建	龙岩市	120.8	27245
18	广东	茂名市	120.4	87348
19	湖南	郴州市	120.2	40643
20	湖南	永州市	120.2	47847
21	江西	抚州市	120.0	35485
22	广东	肇庆市	119.9	46224
23	江西	南昌市	119.7	54622
24	广东	汕尾市	119.5	34730
25	海南	三亚市	119.2	10474
26	江西	赣州市	118.8	87219
27	湖北	黄冈市	118.8	58658
28	湖南	岳阳市	118.8	47216
29	广西	北海市	118.6	21073
30	广东	湛江市	118.5	100124
31	湖北	咸宁市	118.1	26966
32	广东	清远市	117.9	48504
33	湖北	孝感市	117.8	36126
34	贵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117.7	52322
35	广东	阳江市	117.2	26395
36	山东	济宁市	117.1	80110
37	广东	梅州市	117.1	44217
38	陕西	榆林市	117.0	36304
39	安徽	六安市	116.9	37385
40	福建	漳州市	116.8	48089

序号	省	市	0岁人口性别比	0岁人口数(人)
41	江西	景德镇市	116.8	14791
42	广西	玉林市	116.6	74039
43	广东	惠州市	116.5	63083
44	广西	南宁市	116.5	97676
45	山东	聊城市	116.3	51170
46	贵州	铜仁市	116.2	40162
47	广西	贺州市	115.8	26808
48	广东	河源市	115.8	31307
49	河南	信阳市	115.8	52221
50	福建	福州市	115.7	67734
51	湖南	邵阳市	115.6	58810
52	广东	广州市	115.4	161634
53	广西	崇左市	115.3	20319
54	福建	宁德市	115.3	31782
55	湖北	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	115.3	28753
56	湖南	娄底市	115.1	36944
57	福建	厦门市	115.0	49330
58	广西	百色市	114.9	37725
59	广西	梧州市	114.9	36174
60	山东	临沂市	114.8	117003
61	广东	佛山市	114.8	82468
62	安徽	铜陵市	114.7	9491
63	湖南	衡阳市	114.7	55559
64	安徽	合肥市	114.7	95493
65	湖北	随州市	114.6	17707
66	广东	东莞市	114.6	64690
67	安徽	淮北市	114.5	18878
68	安徽	滁州市	114.5	36661
69	广西	防城港市	114.2	12158
70	广西	贵港市	114.2	51080
71	浙江	温州市	114.2	70923
72	贵州	安顺市	114.0	33759
73	河北	沧州市	114.0	60803
74	广西	钦州市	113.9	42366
75	湖南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113.8	24215
76	广东	揭阳市	113.8	83687
77	安徽	安庆市	113.7	37400
78	贵州	六盘水市	113.6	52473
79	浙江	台州市	113.6	46778
80	安徽	亳州市	113.4	52363
81	湖北	武汉市	113.4	94381
82	贵州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113.4	45587

序号	省	市	0岁人口性别比	0岁人口数(人)
83	四川	凉山彝族自治州	113.3	62300
84	广东	深圳市	113.2	165127
85	新疆	塔城地区	113.1	7789
86	山东	日照市	113.1	27401
87	广西	河池市	113.0	38089
88	广东	潮州市	112.9	25528
89	湖北	荆州市	112.9	37893
90	安徽	马鞍山市	112.8	17294
91	新疆	阿勒泰地区	112.8	5756
92	贵州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112.6	42165
93	湖南	怀化市	112.6	40841
94	广东	中山市	112.5	39976
95	四川	广安市	112.5	23756
96	黑龙江	大兴安岭地区	112.5	1073
97	安徽	淮南市	112.4	24673
98	安徽	阜阳市	112.4	87311
99	西藏	林芝市	112.3	2648
100	广东	珠海市	112.3	22367
101	广东	汕头市	112.3	63154
102	江苏	徐州市	112.3	76491
103	河南	商丘市	112.1	80915
104	湖北	荆门市	112.1	16837
105	安徽	芜湖市	112.0	29566
106	安徽	蚌埠市	112.0	30920
107	河北	邢台市	111.9	65201
108	山东	东营市	111.9	19687
109	贵州	贵阳市	111.8	72452
110	山西	朔州市	111.8	12227
111	河南	南阳市	111.7	79206
112	山东	德州市	111.7	43318
113	浙江	金华市	111.7	53300
114	福建	南平市	111.7	20904
115	安徽	宿州市	111.7	56296
116	甘肃	庆阳市	111.6	23598
117	山东	滨州市	111.5	33223
118	贵州	毕节市	111.5	102959
119	湖南	常德市	111.4	37050
120	贵州	遵义市	111.4	83501
121	山东	潍坊市	111.4	83148
122	新疆	克拉玛依市	111.3	3396
123	四川	泸州市	111.1	29697
124	广西	柳州市	111.1	40994

序号	省	市	0岁人口性别比	0岁人口数(人)
125	浙江	绍兴市	111.1	32345
126	江苏	连云港市	111.0	38143
127	湖南	长沙市	111.0	82746
128	江苏	宿迁市	110.9	42715
129	陕西	延安市	110.8	18263
130	广西	桂林市	110.8	45527
131	江西	萍乡市	110.7	16222
132	湖南	湘潭市	110.6	19344
133	山东	菏泽市	110.6	83851
134	河南	濮阳市	110.6	36924
135	山东	泰安市	110.6	41381
136	河北	衡水市	110.5	29716
137	湖北	十堰市	110.4	28909
138	浙江	舟山市	110.4	5765
139	西藏	阿里地区	110.4	2068
140	辽宁	抚顺市	110.4	7060
141	黑龙江	七台河市	110.3	2561
142	甘肃	定西市	110.2	27221
143	青海	海北藏族自治州	110.1	2837
144	江苏	南京市	110.1	65987
145	陕西	安康市	110.1	22967
146	广东	韶关市	110.1	31590
147	新疆	昌吉回族自治州	110.1	11868
148	河南	开封市	110.0	45270
149	广西	来宾市	110.0	23350
150	山东	济南市	109.9	80208
151	湖南	益阳市	109.7	31481
152	宁夏	石嘴山市	109.7	5898
153	江苏	常州市	109.7	33542
154	陕西	宝鸡市	109.7	28484
155	河北	廊坊市	109.7	45331
156	陕西	商洛市	109.7	19701
157	四川	遂宁市	109.7	18157
158	山西	吕梁市	109.6	31393
159	云南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109.6	43353
160	浙江	宁波市	109.5	61975
161	湖北	襄阳市	109.4	42972
162	吉林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109.3	9294
163	浙江	丽水市	109.3	18078
164	云南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109.3	48245
165	甘肃	张掖市	109.2	10221
166	内蒙古	乌兰察布市	109.2	9687

序号	省	市	0岁人口性别比	0岁人口数(人)
167	广东	江门市	109.2	39749
168	江苏	淮安市	109.2	32048
169	河南	郑州市	109.2	118302
170	浙江	衢州市	109.1	17061
171	新疆	吐鲁番市	109.1	5675
172	湖南	株洲市	109.1	30297
173	新疆	哈密市	109.0	4724
174	四川	南充市	108.9	39385
175	甘肃	嘉峪关市	108.9	3319
176	青海	西宁市	108.8	22738
177	甘肃	武威市	108.8	14011
178	云南	昭通市	108.7	73347
179	四川	宜宾市	108.7	37542
180	四川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08.6	7553
181	吉林	白山市	108.6	4771
182	湖北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108.6	29533
183	内蒙古	赤峰市	108.6	30587
184	四川	资阳市	108.6	13471
185	云南	普洱市	108.6	24562
186	河南	平顶山市	108.5	46370
187	江苏	无锡市	108.3	46281
188	吉林	松原市	108.3	10258
189	辽宁	辽阳市	108.3	7152
190	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	108.3	10836
191	吉林	四平市	108.2	7179
192	四川	攀枝花市	108.1	9239
193	吉林	辽源市	108.1	4193
194	云南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108.1	15675
195	河北	保定市	108.1	94090
196	云南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108.0	12859
197	山西	忻州市	108.0	19923
198	甘肃	天水市	108.0	31521
199	湖南	张家界市	107.9	12524
200	吉林	通化市	107.8	8644
201	青海	海南藏族自治州	107.8	6183
202	内蒙古	通辽市	107.8	18763
203	河南	驻马店市	107.8	61655
204	安徽	宣城市	107.8	19084
205	黑龙江	黑河市	107.8	4947
206	辽宁	阜新市	107.8	7409
207	新疆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107.7	10981
208	辽宁	本溪市	107.7	5168
209	浙江	杭州市	107.7	92390

序号	省	市	0岁人口性别比	0岁人口数(人)
210	黑龙江	哈尔滨市	107.7	40128
211	内蒙古	乌海市	107.7	4131
212	河南	周口市	107.7	96842
213	河北	承德市	107.7	26811
214	新疆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107.7	19956
215	云南	临沧市	107.6	24222
216	四川	乐山市	107.6	22938
217	四川	自贡市	107.6	15397
218	山西	太原市	107.5	45265
219	云南	昆明市	107.5	81501
220	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	107.5	9083
221	安徽	池州市	107.5	10674
222	新疆	自治区直辖县级行政区划	107.4	10223
223	四川	广元市	107.4	17570
224	宁夏	吴忠市	107.4	16821
225	辽宁	丹东市	107.4	10532
226	河北	唐山市	107.4	54989
227	青海	海东市	107.4	15973
228	四川	甘孜藏族自治州	107.4	10621
229	河北	邯郸市	107.3	84565
230	新疆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107.3	4841
231	吉林	长春市	107.3	49959
232	江苏	苏州市	107.3	84763
233	陕西	咸阳市	107.3	43989
234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107.2	13216
235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107.2	20053
236	安徽	黄山市	107.2	11393
237	河北	石家庄市	107.2	96264
238	四川	达州市	107.2	33680
239	甘肃	陇南市	107.1	25570
240	甘肃	临夏回族自治州	107.1	34524
241	山东	烟台市	107.1	42613
242	四川	巴中市	107.1	20492
243	云南	曲靖市	107.1	68042
244	四川	成都市	107.0	163071
245	宁夏	中卫市	107.0	13895
246	江苏	南通市	107.0	38881
247	陕西	西安市	107.0	110294
248	西藏	山南市	107.0	3620
249	内蒙古	包头市	107.0	17684
250	黑龙江	牡丹江市	106.9	8648
251	甘肃	白银市	106.9	15795
252	江苏	镇江市	106.8	18753



序号	省	市	0岁人口性别比	0岁人口数(人)
253	西藏	昌都市	106.8	11913
254	山东	青岛市	106.8	80522
255	江苏	泰州市	106.8	24552
256	山东	淄博市	106.8	33640
257	新疆	乌鲁木齐市	106.7	28459
258	新疆	喀什地区	106.7	26053
259	云南	保山市	106.7	23680
260	江苏	扬州市	106.6	23816
261	浙江	湖州市	106.6	22264
262	新疆	阿克苏地区	106.6	19112
263	辽宁	沈阳市	106.6	52987
264	甘肃	甘南藏族自治州	106.6	8674
265	云南	玉溪市	106.6	21363
266	吉林	吉林市	106.5	15469
267	辽宁	盘锦市	106.5	8480
268	山西	大同市	106.3	21541
269	山西	阳泉市	106.3	9360
270	江苏	盐城市	106.3	37240
271	四川	绵阳市	106.3	33787
272	西藏	拉萨市	106.1	6831
273	河南	三门峡市	106.1	18020
274	四川	雅安市	106.0	11685
275	四川	内江市	106.0	19759
276	河南	新乡市	106.0	54686
277	山西	晋中市	106.0	26963
278	河南	焦作市	105.9	32111
279	辽宁	朝阳市	105.8	17495
280	云南	丽江市	105.8	12506
281	辽宁	营口市	105.8	12170
282	云南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105.8	7583
283	河北	张家口市	105.7	28876
284	辽宁	铁岭市	105.7	8852
285	浙江	嘉兴市	105.6	38230
286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105.6	14408
287	黑龙江	佳木斯市	105.6	8154
288	河北	秦皇岛市	105.5	20788
289	陕西	渭南市	105.4	39443
290	湖北	宜昌市	105.3	23052
291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105.2	26908
292	山西	晋城市	105.2	18735
293	甘肃	兰州市	105.2	37053
294	辽宁	葫芦岛市	105.0	13654
295	河南	许昌市	105.0	36435

序号	省	市	0岁人口性别比	0岁人口数(人)
296	青海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104.9	4642
297	河南	洛阳市	104.9	69339
298	辽宁	鞍山市	104.9	14757
299	宁夏	银川市	104.9	31954
300	黑龙江	鸡西市	104.7	4846
301	黑龙江	大庆市	104.7	12126
302	新疆	和田地区	104.6	16857
303	云南	迪庆藏族自治州	104.6	4028
304	黑龙江	绥化市	104.5	12445
305	甘肃	酒泉市	104.4	9194
306	甘肃	平凉市	104.4	18961
307	辽宁	锦州市	104.4	11248
308	山东	威海市	104.3	16284
309	四川	德阳市	104.3	21152
310	青海	果洛藏族自治州	104.2	3571
311	陕西	汉中市	104.1	27803
312	甘肃	金昌市	104.1	3349
313	陕西	铜川市	104.0	5745
314	四川	眉山市	104.0	23310
315	黑龙江	伊春市	103.9	2728
316	云南	楚雄彝族自治州	103.7	23056
317	河南	省直辖县级行政区划	103.6	7451
318	辽宁	大连市	103.5	43116
319	黑龙江	鹤岗市	103.5	3148
320	云南	大理白族自治州	103.5	31156
321	河南	漯河市	103.3	19445
322	青海	玉树藏族自治州	103.2	6558
323	河南	安阳市	103.2	46773
324	西藏	日喀则市	103.2	12756
325	内蒙古	兴安盟	103.1	9611
326	西藏	那曲市	102.9	10552
327	山西	长治市	102.8	27283
328	宁夏	固原市	102.6	14459
329	吉林	白城市	102.1	6672
330	黑龙江	双鸭山市	101.5	4481
331	河南	鹤壁市	101.2	14080
332	山西	临汾市	100.4	33722
333	山西	运城市	99.9	41335
334	新疆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99.7	3034
335	青海	海南藏族自治州	99.1	4752
336	内蒙古	阿拉善盟	97.4	2392
337	海南	三沙市	60.0	8

## 附件5 个人访谈提纲

1. 理想子女数是多少？理想的孩子性别构成是？有男孩是一个家庭必须的吗？
2. 从个人、家庭或家族的角度来看，男孩与女孩在抚养成本、社会评价、经济收益、养老与照护、情感支持、财产继承、传承血脉、家族势力等方面有什么差别？不同经济收入、社会阶层、家族人丁兴旺程度的家庭在这方面的看法有什么差异？
3. 如果只能有一个孩子，希望是男孩还是女孩？对第一个孩子性别是否满意？家人的观点是否一致？如果还打算生育，希望第二个孩子是什么性别？是不是一定要儿女双全？是否会生到生出满意的性别为止？如果想要男孩，觉得几个才够？
4. 家庭与家族是否还保留着一些传统文化习俗？家族祠堂、兴修家谱、祭祖、红白喜事等？当地有些什么风俗存在男女差别对待吗？
5. 现在一些地方男孩成婚很困难，因为适龄女孩人数少了，你怎么看？你担心自己家孩子未来的婚姻问题吗？
6. 交往较多的朋友多吗？邻里与亲属的走动是否多？交往较多的人群对孩子性别观念的主要观点是什么？他们一般孩子性别构成是什么？他们的观点是否影响你生活与生育的想法与决策？
7. 你主要接触哪些媒体？电视、短视频、书刊、朋友圈，这些媒体对你影响大吗？从这些媒体中，你感觉社会上男女差别大吗？
8. 如果怀孕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想到人工流产？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孩子的性别？如果孩子的性别并不是你理想的性别，会想到人工流产吗？人工流产可以去哪里做？

## 附件6：干部座谈会提问提纲

1. 2021年本地区的出生人口为多少？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多少？与2020年比，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2. 出生性别比在不同孩次间有什么特征，哪个孩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是否也呈现出城乡差距？
3. 根据平时的观察，这一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4. 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目前还纳入日常工作吗？主要开展哪些工作？与哪几个政府部门协作？
5. 目前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与胎儿性别选择的人工流产”吗？主要由哪个部门在负责？通过什么手段？
6. 怎么管理本地的医疗机构，制止跨境送检行为和相关的广告宣传？
7. 如何管理14周以上的人工流产？
8. 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相关工作是否纳入工作考核？
9. 你认为本地区的胎儿性别选择行为未来5年会有所减少吗？出生人口性别比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呢？



##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

地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楼1-161

电话: 86 10 6532 0506

传真: 86 10 6532 2510

网站: <http://china.unfpa.org/>

邮件: [china.office@unfpa.org](mailto:china.office@unfpa.org)